

目 录

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	周震麟 (1)
一九一二年筹组国民党湘支部办理选举的经过·····	仇 整 (9)
黄兴与明德学堂·····	黄一欧 (17)
回忆在明德学堂执教时的黄克强先生·····	陶幼甫 (25)
回忆秋瑾·····	王时泽 (30)
四十九标辛亥援鄂始末·····	余 韶 (40)
记杨任常德遇难·····	凌汉秋 (48)
李燮和沪宁革命之经过·····	余焕东 (51)
湖南时务学堂略志·····	唐才质 (55)
湖南陆军小学·····	戴凤翔 杨传清 陈鹏南 (59)
从清末到北伐军入湘前的湖南报界·····	张平子 (65)
长沙辛亥光复后的片断见闻·····	陶菊隐 (91)
谭延闿阴谋推翻革命政权·····	张知非 (97)
——焦、陈被害前夕都督府的一场争论	
一九一〇年长沙饥民抗暴见闻·····	文 斌 (99)

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

周 震 麟

(一)

湖南自咸、同以后，许多文官武将，出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称为“中兴功臣”。他们退職回籍后，地方官吏自巡抚以次，都特别尊重他们，不敢得罪。因此，绅权之大，常能左右一切。当湘籍留学生纷纷回省办学的时候，绅士中有一群特别顽固的人，以王先谦、叶德辉和孔宪教为首，拚命反对开办学堂；而一般青年志士，则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多办学堂。于是湖南新旧两派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教育界。一九〇三年春，胡元倓等开办了私立明德学堂，成了新派的中心。因为该校的教员如黄克强先生、吴禄贞、张继、苏曼殊和我，都是革命派。顽固派王先谦等，对明德学堂大加指责。两派相互斗争，曾引起多次风波。

明德学堂开办的这年夏天，谭延闿从北京会试归来，应邀来校参观，当表示热心赞助，并愿为学堂负筹措经费的责任。可是这时他的父亲谭鍾麟还在世。谭鍾麟也是一个顽固派，尽管搜括的民财很富，却不愿出一文钱办学堂。谭延闿的妻子方夫人，出身官僚家庭，赔嫁的金器首饰不少，谭就取出兑换，支援了明德的经费。我们看到他这样热心教育，就把创办其他私立学堂的立案、请款和拨给校舍等事情，请他出面和官府及绅士们打交道，

以便减少阻力，顺利地解决问题。这两年里，湖南学堂之多，学生之众，为各省冠。国内外革命同志来到湖南参观的，莫不惊异赞赏；而且借参观的机会，进行革命联系，彼此互通声气。当时的谭延闿，不过是一个热心教育的绅士而已，关于这些革命活动，我们对他是严守秘密的。

辛亥湖南光复前夕，官绅们已经看到了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湖北首义后，湖南已呈山雨欲来之势。对于新的主政人物的选择，官绅们自然要为他们自身的利益作打算了。他们原来属意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想把他捧出来维持局面。当时龙璋和谭延闿，都曾向黄劝说过。直到焦、陈起义，杀掉了黄忠浩以后，官绅们才转而阴谋推戴谭延闿出主省政。

（二）

一九一一年夏历九月初一，焦达峰、陈作新在长沙领导了起义。我在两个月以前奉黄克强先生之命，由北京经上海秘密回到湖南，在长沙约集各方面同志秘密开了多次会议，布置军事，约定夏历十月起义，并严诫毋蹈过去因事机不密以致失败的复辙。为了避免暴露，大家要我避居宁乡原籍，到期派人掩护入省。由于湖北提前起义，湖南势必提前响应。长沙光复的第五天，由洪春台、洪兰生派人持焦、陈两督的安民布告促我晋省。我到省后，看到督署新旧军人争功论赏，纪律很差；焦、陈两督军书旁午，穷于应付。两督见我到来，也没有和我商谈革命的具体问题。有一次，我因事到督署会晤焦达峰，他正在案头摆着一堆礼服样本，和裁缝工人一道，挑选研究都督制服的式样。我当时感到他已经有点陶醉于革命的初步胜利了。

湖南光复后，黄克强先生由上海到武汉主持军事；派谭人凤

到长沙，督促出兵援鄂。焦、陈两督正在一心调遣军队援鄂之际，不料新由益阳防地调省的第五十标营长梅馨纵兵叛变，两督以湖南起义首功，竟同遭杀害。梅馨利欲薰心，加以出身留日士官，自恃才高，不肯下人，竟充当了戕害革命领袖的刽子手，其结果终身为社会所不齿。

发纵指使这次叛变的主谋者，一般公认是谭延闿所主管的原諮议局；特别是副议长陈树藩（炳煥），为谭出力不小。当湖南光复，一般諮议局议员叫嚷推举谭为都督的时候，他表面上是既不肯，也不拒绝。实际上自从焦、陈以起义首功被推举为正副都督的那一天起，諮议局议员就四出进行诽谤，特别是挑拨新旧两军之间的关系。他们攻击焦都督是“会党”，陈副都督在起义前不过是一个新军中的排长，并强调“维持秩序”，扬言焦、陈两督“年少望浅，不能服众”。大有不达到拥谭篡夺革命政权的阴谋目的不止之势。谭延闿就职伊始，即用都督印信给陈树藩的亲属下委札，不下五十余件，旋又用公费为他们派送了好几个西洋留学生；而陈树藩本人一直做着湖南省财政司长。这种种作法，在当时是人言啧啧的。

焦、陈两督被害后的头两天，市民惶骇，谣逐繁兴，说革命派要为焦、陈报仇，反动派还想继续残害焦、陈部属。谭延闿初任都督，一方面感到湖南局势还未稳定；另一方面感到革命党人对他的压力很大，终日胆战心惊，惶恐不安。

恰好这时克强先生来了一封长函给我和谭人凤，对湖南事变作了详尽的指示。内容大致是：为了稳定全局，湖南局面不能再乱，如果再乱，湖北将会支持不住，其他各省响应亦恐发生迟疑观望，我们再不能失去这次两湖光复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然谭延闿已经被推举为都督，就应权且维持他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

信中一再强调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出兵援鄂；并指定我留在湖南为谭延闿壮胆，调谭人凤返鄂参赞戎机。

我遵照克强先生的指示，表明了个人不做官、不争权、专做事的态度。于焦、陈被害的第三天，在金盆岭广场召集新旧两军开会演说，人民群众也围聚倾听。我首先代表同盟会和克强先生，旌恤焦、陈两督，以明是非。然后对他们说：现在清朝皇帝还没有退位，敌人的兵力还很强大，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斗争任务非常严重。大家都是爱国者，革命者，新旧两军决不容许互相歧视，互相排斥；而应该严守纪律，听候黄总司令编调援鄂北伐，共同奋斗。至于湖南的局面，谭延闿既然做了民国的都督，就得革命；既然革命，我们就得维持他的威信。值此革命紧要关头，必须目光远大，顾全大局，才能得到全国各省的响应和支持。最后把汉阳吃紧和湖南省库空虚的实际情况都告诉了他们。他们都深受感动，热烈鼓掌。我本来带着几万元准备犒劳他们的，他们听说省库空虚，援鄂餉糈重要，一致表示不受。从此人心日趋安定，很快地组成了第二批援鄂部队，出发援鄂，与湖北起义军在汉阳并肩苦战，支持了十余日，又共同扼守武昌。

我还同谭延闿一道挽请了刘人熙出任民政司长，龙璋担任湘西巡按使。如上所述，谭延闿第一次督湘，革命党人迫于形势，是支持了他的。

谭延闿的统治地位既趋稳定，就逐步在各方面布置自己的势力。他的政治活动骨干始终是原来的谘议局议员，亦即宪友会会员。他选派了唐昆臣坐驻北京，通过汤化龙的关系，进而和黎元洪、袁世凯勾结。另外还有一些在京的湘籍官僚为他奔走。唐昆臣从北京向谭延闿密报消息的函电极勤，我在督署经常目击这种情况。至于他们内部的阴谋活动，谭延闿对我是保密的。

(三)

中山先生让总统位于袁世凯以后，同盟会旋改为国民党，又改总理制为理事制，中山先生任理事长，设国民党本部于北京，派宋教仁（教仁）代为主持党务。教仁头脑明细，手段灵敏，办党数月，袁世凯所支持、利用的共和党不能相与匹敌。临时参议院宣布召集国会，教仁南北奔走活动，党势益振，在国会选举中国国民党已操胜算。当时流言，如由国会产生政府，仍将选举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为正、副总统，教仁为国务总理。于是袁党和共和党都集矢于宋教仁了。

我于一九一二年春，被推为组织政府的湖南省代表，到了北京，曾和袁世凯面谈几次。他对于湖南地方关于财政、外务方面的要求，口惠而实不至，只是以官位拉拢个人。我看出他对国民党深怀嫉忌，绝无拥护共和的诚意，不辞而别，回到湖南。当时宋教仁任农林总长，住在三贝子花园（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办理党务。我在京时曾和他在畅观楼同住了一个多月，协助工作，并提醒他对袁世凯严加注意。国会选举完毕，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案发生，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急电湖南，要我和谭延闿迅速准备长江上游的军事。我先到江西、安徽，和李烈钧、柏文蔚商议共同准备，然后到上海参加了布置讨袁的会议。会后，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仍派我回到湖南，积极准备行动。

一九一三年春，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日益暴露。我催促谭延闿加紧布置军事，他却故意延宕，没有积极行动。后来虽在革命党人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独立，但不久又取消了独立。听说他在致徐世昌的密电中有这样一段话：“湖南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这就表明了

他当时的两面态度。在取消独立的前夕，他害怕革命党人据湘讨袁，便纵容袁世凯收买的奸徒向瑞琮等，放火焚毁了我们艰苦经营的军械局，企图用消灭革命武器的办法，迫使革命党人离开湖南。取消独立之后，谭延闿还想恋栈投降，但是，袁世凯却认为他不可靠，并且要把北洋势力伸展到西南门户的湖南，就改派了汤薌铭督湘。谭延闿在汤薌铭抵湘前离省，后来竟无耻地入京向袁世凯请罪。汤薌铭下车伊始，就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残酷地镇压革命。

(四)

一九一六年讨袁军事结束，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回到上海，筹商对付北洋军阀的策略。我主张克强先生亲自督湘，以便领导西南各省，应付非常。这时谭延闿也在上海，表面上附和，背地里却从北京通过黎元洪由段祺瑞发表了他自己二次督湘。接着黄克强、蔡松坡两先生相继逝世，革命党人失去了军事长城，直皖两派军阀更加轻视西南，曹锟陈兵湘鄂之间，北洋军阀势力日益嚣张。谭延闿也因黄、蔡两先生的逝世而减轻了对湖南革命党人的顾虑，专心致志地去巩固他自己在湖南的统治地位了。

一九一七年，段祺瑞承袭袁世凯的故技，撤换了谭延闿，改派傅良佐督湘。傅良佐在湘没有实力，不久就因刘建藩、林修海在零陵起义而被驱逐下台。段祺瑞又派拥有兵力的北洋军阀张敬尧督湘。这时直系军阀吴佩孚进据湖南衡阳、宝庆一带，谭延闿率部据守湘南郴、永一隅。适值直、皖关系日益恶化，谭延闿联合直系，吴佩孚让出衡、宝，回师鄂、豫。到一九二〇年六月，谭乘张敬尧被驱逐的机会，实现了三次督湘。

湖南自谭延闿取消独立以后，经过汤薌铭、傅良佐和张敬尧等北洋军阀的残酷统治，人民受尽了痛苦，革命党人或惨遭屠杀。

或被迫流亡。其他各省情况也相类似。但是，中山先生始终没有因革命实力遭受挫折而气馁，而是百折不回、再接再厉地领导着革命继续前进。

（五）

一九二〇年，中山先生在上海决定北伐大计，先使陈炯明、许崇智率援闽粤军回粤，驱逐旧桂系莫荣新、沈鸿英等；随即号召国会议员南下，凑足法定人数，正式开会于广州，选举总统，成立革命政府，然后大举北伐。这年夏天，我代表中山先生到福建漳州会晤陈炯明和许崇智，商定回粤计划。陈、许主张我回湖南说服谭延闿分兵入北江声援，并议定由中山先生筹措开拔费用，湘军进入粤境，即可由粤方供给饷糈。我回上海报告，中山先生完全同意，命我积极进行。我先用个人名义，写信给谭延闿，传达了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和对湖南的要求。谭延闿回信唯唯从命。我即持中山先生手函回湖南面交谭延闿。我到长沙不久，中山先生又派李执中、覃振、柏文蔚和张继先后来长协助工作。我就放手召集各军的军官和士兵开会，宣布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以及对于湖南军人发扬革命传统的期望，给予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当时驻省军官鲁涤平、陈嘉祐，驻醴陵第六区司令李仲麟，都积极拥护中山先生北伐，各自调遣所部，集结省城待命。而谭延闿则态度冷淡，故意延宕，不肯发布出兵明令。直到一九二〇年八月，援闽粤军如期发动了，谭延闿还是处之淡然，邀请吴敬恒、章太炎等来湘演讲，游山玩水，酒食征逐，无视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我催促他早日出兵，说得舌敝唇焦，他还是推诿不决。于是我决计和湘军将领合作倒谭。议定推赵恒惕为总司令、林支宇为省长。与此同时，张振武杀了不服调遣的萧昌炽，廖家栋率第三旅会合

各军，逼近省城。我认为倒谭时机已经成熟，就委托护法国会议员陈嘉会劝谭延闿自动离开湖南。谭打电话向我哀请等安葬了他的夫人再走，因为他的夫人死在上海，灵柩正在运回湖南的途中。我回答他说：“为了维持省城秩序，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务必马上离开。至于使你不能够为夫人亲营葬事，我不久回上海当面道歉。”他只得忍痛登舟，回到上海去了。

倒谭以后，陈嘉祐等率兵到了韶关，声援援闽粤军回粤，驱逐了旧桂系莫荣新、沈鸿英等。于是中山先生重返广州，组织大元帅府。不料赵恒惕在我赴粤复命的时候，竟背信弃义地在长沙惨杀了李仲麟等，又成了中山先生北伐的障碍。

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在广东叛变以后，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同志多集中在上海。不久，许崇智奉命率粤军和新桂军讨逆。叛将洪兆麟赖世璜等，向我和李烈钧表示悔改，愿意立功赎罪，欢迎我和李烈钧去粤。同时，留粤滇军欢迎杨庶堪。谭延闿这时也在上海，向我表示悔悟。我正感革命武装力量薄弱，认为谭延闿如果真有悔悟之心，忠诚地参加革命，还可以号召湘军旧部鲁涤平、陈嘉祐等，提兵相助，以壮革命声势。因此，重新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晋谒中山先生。谭延闿在辛亥革命后加入过同盟会和国民党，但和中山先生的会见，这还是第一次。一九二二年夏历除夕，李烈钧、杨庶堪、谭延闿和我四人，随同中山先生由上海搭乘海轮驶赴广州。

谭延闿到了广东以后，还是不忘情湖南的地盘。他的党徒曾包围中山先生，想借中山先生之力恢复他在湖南的统治地位。但是，这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不可能了。

关于谭延闿统治湖南始末，仅就个人接触所及，回忆如上。湖南的老年人士，知道详情的还有不少，尚望补其缺漏，正其疏失。

一九一二年筹组国民党湘支部 办理选举的经过

仇 鳌

辛亥革命以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封建军阀篡夺了政权，同盟会内部起了分化，组织趋于涣散，成员中有一些人实际上离开了组织，有一些人则另树旗帜，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和民社等团体。原来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取消了，其成员分别组织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统一党和国民协进会等团体。不久，这些原非同盟会的团体和由同盟会分化出来的团体，合并组成统一党，以后又进一步扩大组织，并改名为共和党。与此同时，还产生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民国公会、共和促进会和国民新政社等较小的团体。

当时参议院中，还是以同盟会为第一大党；与同盟会相抗衡的共和党为第二大党；介乎二者之间的统一共和党为第三大党，此外就是以上列举的那一些小党派。同盟会虽然是第一大党，却没有能够占到压倒的多数。同盟会面临着同袁世凯及与其相援结的共和党在参议院内、外的斗争，同时又处于小党林立的形势。这对同盟会显然是不利的。为了改变这种形势，同盟会的主要骨干分子宋教仁主张联合政治主张相接近的一些小党派组成一个压倒一切的大党。经过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便和参议院内的第三大党——统一共和党，还有其他一些

小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改组为国民党。

当时，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任务就是争取在改选后的参、众两院中占有压倒一切的多数议席，并进而使本党以国会多数派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掌握政权。宋教仁和其他党内同志都主张：将来的正式总统，虽可继续选举袁世凯，但是政治大权应归内阁；而内阁必须由本党以国会多数派来组织，才能根据约法发挥改党的责任内阁制的精神，使国家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轨。要实现这一目的，则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办一次胜利的选举。为了要取得选举的胜利，又必须把全国各地的党部，好好地组织起来。

国民党北京总部成立以后，马上做出详细计划：第一、派人到各省成立国民党支部；第二、掌握各省、县的选举，进行一次胜利的竞选；第三、取得国会及省、县议会中的压倒多数，坚持议会民主制；第四、及早准备组织强有力的、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并且预定以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同盟会还在未改组以前，就已注意物色各省组党和掌握选举的负责人。当时各省的情况不一样，有的比较复杂混乱，象湖南就是如此。对于这些情况复杂混乱的省份，人选更宜郑重考虑。

湖南在辛亥起义以后不久，革命派的焦达峰、陈作新两都督，被反动分子杀害；原属宪政派的谭延闿，因利乘便，继任都督。当时湖南政局极不安定。同盟会对焦、陈被害，深为愤慨。反动势力虽然阴谋杀害了焦、陈，但同盟会所领导的革命势力仍居优势，不能不使他们反侧不安。湖南响应首义比较仓促，同盟会对政治工作的准备不足，干练一些的人当时又都不在湖南；比较有办法的，只有一个原任司法司长的洪春台，隐隐成为湖南同盟会

的重心，不幸在这时候死了。湖南方面向北京请示，要求派人回去主持。

同盟会在北京的负责人要派我回湖南，负责党务和选举工作。那时国民党改组正在进行，成立大会还没有开，总部还没有成立。作为一个老同盟会员，对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和进一步经过竞选而成为议会中的多数派以实现政党的责任内阁的计划，我是始终与闻，而且完全赞同的。但是我当时在北京办报（亚东新闻），无意办党和从政，所以对于回湘的使命，再三推辞，不肯担任。经过北京负责方面的再三敦促，并同意了我所提出的在办理改组和选举工作后引退的条件后，我才接受任务，于一九一二年六、七月间回到湖南，筹备党的改组工作，并负责掌握湖南的选举。

当时湖南政治上是怎样一种情况呢？这里不得不追述一下会党在湖南首义中所起的作用和由此而产生的某些影响。

同盟会和以前的华兴会，一贯以联络、利用会党作为革命的主要策略之一。一九〇六年湖南哥老会的焦达峰加入同盟会，后来被推为调查部长，专负联络各省秘密会党的任务。他联络各省会党首领，共同发起组织共进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团体，运动三合、哥老、洪江、孝义等会党，共同参加革命工作。一九〇九年，焦达峰往来湘鄂之间，在汉口设立共进会的总机关，在长沙设机关部。在共进会的策动下，两湖的革命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九一〇年，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策划长江流域各省的起义，并以共进会和其他的会党团体为基础，成立湖南、湖北两省分会，委派焦达峰主持湖南的革命活动。

这种联系和利用会党的策略，在当时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一九〇六年的萍、浏、醴大起义，就是在同盟会领导之下，由当地

的哥老会、洪福会、武教师会等团体搞起来的；武昌起义和湖南响应时，都曾得助于会党的力量。所以湖南起义后，焦达峰被推为湖南都督，是顺理成章的。

会党在辛亥革命时，虽然表现了它的力量，起了积极作用，但在起义以后，要搞政治斗争和政治建设时，它就一筹莫展了。所以反动派得乘机钻入，阴谋破坏，利用反对所谓“江湖作风”为口实，进行煽风点火，造成杀害焦、陈的事变。

事变以后，湖南政治上的中心力量，还是在同盟会方面。而同盟会却拿不出政治上的一套办法。当时我把北京方面所决定的一套办法拿出来，同时针对湖南的具体情况，提出我的主张和办法。当然，在当时的动荡和混乱的情况下，能够拿出政治上的一套办法，是各方面一致欢迎的。

我回湖南不久，经过多方联系商洽，自同盟会内部以至政治上、社会上的各方面人士都认为我所拿出的办法很好。因此，我能够得到各方面的合作，而顺利地实现此次回湘所负的使命。

为了实现此次回湘所负的使命，首先必须把湖南各方面的力量联合起来，团结在国民党的党纲和政策之下，形成一个联合战线，以便和袁世凯所代表的极端反动的军阀、官僚势力作斗争。

原属同盟会会员和不属同盟会的革命派人士，是国民党的基本队伍，当然是我首先应该团结的力量。他们对于原来的“江湖作风”有些不满，但又苦于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在和我接洽之后，马上消除过去的徬徨苦闷的情绪，满怀信心地团结到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发挥各个人的力量。

同盟会内的会党分子，对于焦达峰的被害，一直气愤不平。我过去参加革命工作时，既搞政治，也搞江湖，略为懂得江湖的一套。我回湖南后，特别拉拢他们，但同时把现在不能搞“江湖”

一套的道理，向他们反复说明。经过一番努力，一方面缓和了他们的不平之气，一方面使他们接受我的一套政治办法，而积极参加到组党和选举的工作中来。

原属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的人们，过去都是一些改良主义者，但在辛亥革命之后，他们中间许多人不得不隐蔽君主立宪的思想，对于议会民主制表示赞同。因此，经我稍加拉拢之后，大多数都转到我们的旗帜下来了。

当时的湖南都督谭延闿，他过去是宪友会在湖南的主干。革命成功以后，他的思想情况，当然与上述的宪友会分子基本相同。在焦、陈被害以后，湖南政治上没有重心，他就应运而起。我当时对谭这个人的看法是：他对于孙中山、黄克强和同盟会的力量，是看得到的，因此不敢过于立异，公然站在反动的一边；但是要他真心地站在革命方面来，当然也不可能。在焦、陈被害以后，同盟会与谭延闿有矛盾，不过比起同盟会与袁世凯的矛盾来，就是次要的了。

我回湖南把国民党的一套办法对谭延闿谈了，他很表赞同。以后，凡是我們提出的办法，他都欣然乐从。后来黄克强、宋教仁先后回湘，当然与他过去认识的民党人士不同，使他对国民党的观感有所改变。他说宋教仁是“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上的人物可比”，因此他表示愿意加入国民党，我们也决定拉他进来。谭在湖南代表改良派和其他一些旧人，把他拉过来以后，这些人也就跟着过来了。

我以前没有在湖南工作过，这次回来，对于湖南的政界、军界、社会人士和江湖朋友都是初次碰头。经过三个月的时间，终于把各方面的力量联合起来。于是一面着手改组国民党，一面布置选举。

因为我是在北京国民党总部成立以前两个月就回到了湖南，从事湖南党的改组工作的，所以在总部成立的通知到湘后，不到一个月，即在九月下旬，国民党湖南支部就正式改组成立了。

为了扩大党的基础，并便利党的政策的推行起见，在成立大会上，推举谭延闿为支部长，我为副长。实际上，党务工作是由我负责的。以下还有总务主任周声骏、政事主任刘武、交际主任周震麟、会计主任陈树藩、文事主任吴景鸿。支部内还设有评议会，评议长龙璋，评议员刘人熙、陈强等五十七人。又设有政务研究会，会长杨德邻，副长罗杰；法制主任彭兆璜，政务主任陶思曾，经济主任周砥，外交主任陈安良，军务主任陈嘉祐，教育主任萧翼鲲。从以上机构的设置和人事的安排，也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所联系的方面之广。

湖南支部成立以后，谭延闿仍任都督，我任民政司长。各县县知事（县长），都是由民政司直接委派的。我当时和谭延闿分工，军事方面由他去对付，政治和社会方面都由我负责。

接着我们就以全力布置选举。这是一个重大工作，根据政治形势的要求，是只可成功，不可失败的。成功的关键在哪里？首先在于民政司。民政司是主办全省选举的机关，民政司长是法定的选举总监督；各区的分监督也是由民政司选派的。其次，在于各县县知事，知事主办一县的选举，并兼县选举监督；可是知事又是由民政司委派的。再就是由湖南支部派往各县组党的人，直接代表党来竞选。

在这里应该补说一点，在我回湘以前，北京方面曾有一个误解，以为选举是由司法司主管的，所以他们布置，要我接任洪春台的司法司。回湘以后，才知道不是这回事，北京的布置错了。那时湖南民政司是刘人熙，乃是湖南的老辈。为了完成选举的任

务，由刘人熙让出了民政司，改由我来担任。这样，在选举工作上，才能收到指臂之效。

我到民政司以后，把各县知事作了一番调整。随后派出了五区的选举分监督：一区龙璋，二区苏鹏，三区唐璧，四区戴展诚，五区黄右昌。于是省、区、县的选举负责人，联为一气了。同时，由党支部分派了各县的组党人员，成立县的党组织，并立刻展开竞选工作。到了临近选举的时候，每县都派了选举大员，党也派了视察员下去。我就是这样布置了全省的选举。

从一九一二年十月到一九一三年二月，全省选举完成。从国会、省议会一直到各县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数当选。

湖南的选举工作是以压倒的优势胜利完成了。同时，全国各省，国民党在选举中也都得到了胜利。根据统计，众议院596个议席中，国民党得了360多席，除去跨党的不计，还有267席；参议院274个议席中，国民党（除去跨党的）得了123席。如果在宪政正轨中活动，不遭到袁世凯的阴谋和武力破坏，国民党既然得到参、众两院的压倒多数，则正式政府的责任内阁，当然非国民党莫属了。

当湖南及其他各省的选举正在胜利进行的时候，宋教仁于一九一三年二月，回到湖南，参加竞选。因为临时约法规定，担任组阁的，应该是国会议员。宋教仁回湘后，湖南省议会举他做参议员。由于众望所归，一声喊就把他抬出来了。

宋教仁当时到各处演说，对于时政得失，尽情发挥，无所顾忌。他明白提出：正式总统虽可举袁世凯，但内阁必须以在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改党组织，以符立宪政治的正轨。同时分析当时选举形势，说明国民党已经肯定要在国会中占到多数议席，因此他决定准备组阁，毫不含糊。这本是当时所谓先进立宪国政治家

应取的正常态度，一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又和湖南党政负责人商谈组阁计划，同时研究如何把湖南的政治地盘搞好。他邀谭延闿担任责任内阁中的内政部长，仍兼湖南都督。因为谭的父亲谭锺麟和袁世凯的上辈袁甲三系拜把兄弟，他想利用谭和袁世凯的世谊关系，在府、院之间起调协的作用。他还提出把湖南民政司长升格为民政长，统辖各司。在都督进京担任内政部长期间，由民政长代理都督职务。

当时谭延闿及其他参加讨论的人都同意了这个计划，但我没有表示同意。宋、谭当时再三劝我同意这个布置，我坚决不肯，并说，等选举结束后，一定要离开湖南。争论了一晚，他们最后叫我不要反对这一整个的布置。我说，对于计划本身，我不反对，但对我个人有关部分，必须重新考虑。谁知他们认为不反对就是赞成，宋教仁根据那晚所谈，即时把他的全部计划，电告国民党北京总部去了。

原来袁世凯派有侦探驻在长沙，探得了宋教仁准备组阁的全部计划，报告了袁世凯，因而促使了袁世凯急于刺杀宋教仁，不能等他回到北京。因为宋一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无法加以阻止的。

不久，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袁世凯大肆搜捕国民党人，公然毁弃约法，停止国会，实行独裁。国民党的实现议会民主制的想法就这样终于破灭了。

至于我个人，原来打算在湖南选举结束后，即行离湘；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传来，更促进了我的去志。袁世凯对于湖南国民党人士，必欲得而甘心者，有当时叫出的“麟（指周震麟）、凤（指谭人凤）、龟（指我，因为‘鳌’字的本意为‘海中大龟’）、龙（指龙璋）”四人，也使我在湖南待不下去。因此之故，不久我就离开湖南了。

黄兴与明德学堂

黄 一 欧

谈到先君克强先生与明德学堂的关系，先要把明德学堂创办的经过，简单叙述一下。

明德学堂是清末湖南创办的第一所中等私立学校，它的主要创办人是胡元倓。

胡元倓，号子靖，晚署乐诚老人。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生于湘潭。他少承家学，由附生选光绪丁酉科拔贡；一九〇二年被选送日本留学，进了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胡元倓在日本留学时，慕福泽谕吉之创立庆应义塾（后改庆应大学，以财政经济科著名），造就大批人才，便立志回国创办学校，从事教育救国。同年冬，胡元倓学成归国，首先在江苏泰兴会见了龙璋（号硯仙，时任泰兴县令），与谈兴学计划，龙极力赞同。胡回到长沙后，又得到龙璋之弟龙绂瑞的支持，由龙氏兄弟各出银元一千元作开办费，赁湘春街左文襄祠民房为校舍，开办明德学堂，自任监督。学堂招中学两班，于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阴历三月初一）正式开学。其时科举尚未废除，胡元倓以一个穷拔贡办起了洋学堂，一般劣绅迂儒，公开反对甚烈。于是，他找到龙绂瑞的父亲、在籍刑部侍郎龙湛霖，出面担任学堂总理，借龙的地位权势以避谤。这年夏天，胡元倓捐募到一笔款项，特地赴杭州聘华紫翔来教英文，并加招中学一班，又成立了

速成师范班。

胡元倬是在弘文学院求学时和先君认识的。当他初入弘文时，先君已先在该院速成师范班肄业，以同乡关系，彼此过从密切。一九〇三年夏，他往杭州聘英文教员，道经上海，碰见先君刚由日本回国，因此，坚邀先君来明德共事。先君当面应允，不久就回到长沙，主持明德学堂新成立的速成师范班（后又兼任学监）。师范班第一期招收学生一百一十八人，分为两班上课，于一九〇四年五月毕业。当时明德学堂聘请的教员中，有一些是具有排满革命思想的，如周震鳞、苏曼殊、秦毓蓁、翁巩、张继、陈风光、陆鸿逵、李步青、金华祝、沈迪民等人。先君除担任教务行政工作外，并兼任历史及体操教员；遇其他教员缺课时，文科方面的课程，如国文、地理、图画等科，多由他代课。

胡元倬虽然请出龙湛霖担任明德学堂总理，但是劣绅们对学堂的攻击并不就此罢手，仍在布置爪牙，兴风作浪。如地理教员周震鳞在历史教员陆鸿逵的学生课卷上手批的奖励语，措词激烈，顽固派教员刘佐楫便唆使单某向巡抚赵尔巽告密，说明德学生倡言革命，蓄意造反，结果周震鳞被迫离开明德，与一部分学生在长沙马王街另创修业学校。这个刘佐楫，就是大劣绅王先谦派进来刺探消息的。这次事件发生后，胡元倬商之于龙湛霖，另赁西园龙宅西侧房屋为校舍，开办经正学堂，招新生两班，以李步青主教务。明德与经正，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从上述告密事件看出，明德学堂是当时湖南新旧势力互相交锋的场所之一。一方面，有一批革命党人在这里鼓吹革命排满思想，隐为革命中心；另一方面，又是顽固势力的活动地方。胡元倬延揽人才是兼容并蓄、无所不包的。他既邀了先君与周震鳞、苏曼殊、张继、秦毓蓁、陆鸿逵等人来校共事，并尽其力之所及，

多方掩护他们的活动，又聘请谭延闿继龙湛霖任学堂总理，黄忠浩也挂了校董名义；湖南立宪派的重要分子如栗戡时、廖名缙、刘佐楫、曹典球等都先后担任过明德学堂的教职员。此外，胡元倓通过龙氏兄弟的斡旋，和清廷官方也保持了一定的关系。如请当时的湖南巡抚赵尔巽来学堂参观，和学务处总办张鹤龄也有交往，兵备处总办俞明颐、长善学务处总监俞诒庆，都是胡元倓的留日同学。这样，胡元倓利用官、绅权势以维持明德学堂，利用学堂以掩护革命党人的活动，而基本的态度是倾向于革命的。

一九〇四年春，上海道湘潭袁树勋捐助明德学堂一万元，胡元倓即以此款在上海购置理化仪器及博物标本，聘请日本人堀井觉太郎为师范班理化教员，永江正直为博物教员。仪器和标本都已买齐，教员也聘来了，只待找一个通日语的助教，即可开讲。这时，恰好陈介（湘乡人，号蔗青，先后任国民党驻阿根廷、德国大使）由日本回国省亲，到了长沙，先君与胡元倓就留他在明德担任助教。陈介本来是打算再去日本升学的，因与先君和胡元倓在弘文学院同学，经老同学力劝，也就勉强留下来了。他除担任日本教员的翻译工作外，并兼任新成立的小学部主事。

当时明德学堂小学部的校舍在西园周氏花园，教员都是由中学教员兼任的。明德办了小学，先君就叫我入校读书，编在小学乙班，其时我是十二岁。唐伯球、陈果夫、阎鸿飞、宾镇远都是我在明德小学的同学。先君当时兼任小学的博物学（动植物）和地理教员。他教博物时，常常带着实物或标本讲解，听起来很易领会；上地理课则必带地球仪，并指导学生画地图。因此，大家对于上博物、地理课都很感到兴趣。先君当时已经剪了辫子，在学堂里多穿浅紫色长褂或一种对襟短装的体操服（俗称操衣，夏白、春秋蓝、冬青色），天气炎热时，常见他光着赤膊，坐在周氏

花园塘边树荫下，和同事谈天或者独自看书。

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先君在长沙秘密结合同志，组成华兴会。华兴会与明德学堂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主要成员中，有的是明德学堂的教职员，如周震鳞、张继、苏曼殊、秦毓璠、翁巩、陆鸿逵等；有的是明德、经正两学堂的学生，如柳继忠、陈嘉祐、姚洪业、宁调元、萧翼鲲、张启汉、胡瑛等（明德教职员、学生参加华兴会的还很多，有的我不知道，有的已记不起姓名了）。也有本人不在明德，而与明德有密切关系的，如仇亮（湘阴人，号蕴存，后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军衡司长）是明德教员仇道南的儿子；吴禄贞是因为先君邀他到明德担任体操教员，在长沙加入华兴会的。或者当时不在明德，而后来与明德发生关系的，如章士钊于一九一三年任明德大学校长。明德教职员中有些虽未加入华兴会，而对革命运动深表同情或者实际参加革命活动的，如陈风光、李步青、金华祝、沈迪民、陈介、王正廷（辛亥革命后任参议院副议长，议长为张继。正副议长都任过明德学堂教员）、辜天佑、陆鸿第、陆鸿宾等。冯自由写的《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载《革命逸史》第三集）一文中，把胡元倓、龙璋都列为华兴会会员。就我所知，他们热心赞助华兴会的活动，却没有加入华兴会的组织。

华兴会成立后，运动新军、会党，组织武装起义，在在需要经费。先君为此出卖了在长沙东乡凉塘的祖业田产近三百石（最初卖与张姓地主，后由张家转卖与王先谦）；张斗枢在南阳街经营图书仪器印刷业务，先后捐助达万余元；柳聘农、柳继忠、龙璋、陆鸿逵、彭渊恂等都提供了一部分经费。

先君在明德学堂教课，给他从事革命活动以很多的便利。如张继、秦毓璠、翁巩等人都是由先君邀来长沙共图起事，特意介

绍到明德学堂教课，以为掩护的。一九〇四年先君与刘揆一、马福益等商议，决定趁西太后七十生辰，全省文武官吏在皇殿行礼朝贺时，预先在拜垫下面埋好炸药，一网打尽，乘机占领长沙，作为革命根据地。而准备起义用的炸弹，就是在明德学堂理化教员堀井觉太郎（癸丑讨袁失败后，先君亡命日本，堀井觉太郎关心旧友，特意腾出他在东京市郊巢鸭目白的房子让先君居住）的帮助下，在理化实验室里秘密制造的。陈介在一九四七年所写的《明德话旧》一文中，曾提到过这件事。这次起义事泄失败，当差役来拘捕先君时，他由明德学堂逃匿西园龙宅，得龙氏兄弟的掩护和圣公会黄吉亭牧师的帮助，脱险往上海。临走时缺少旅费，胡元倓从外间借了三百元送给他，才搭日清公司轮船“沅江丸”离开湖南。

一九〇五年秋天，我同黄积成一道去日本。第二年秋天，先君从南洋回来，我跟他住在东京牛込区东五轩町林馆。这时，先君多次问及明德学堂和他所熟识的明德师生的情况，言谈之间，非常关切。

一九一一年黄花岗之役以后，我由香港亡命东京。这年夏天，同盟会派一批同志回湖南工作。当时我化名黄祖光，同刘大辉、刘况、陈嘉立、陈嘉任、罗应坤（广东人）、陈模、石磊（均湖北人）等人由东京回到长沙，集体住在明德学堂。我们一面和在长沙活动的同盟会员谭心体、曾杰、唐蟒等人取得联系；对外则宣传成立野球会（野球一名棒球，起源于美国，当时在日本风行一时），招收青年学生学习打野球，以增强体质。实际上我们是借这个名义团结同志，并因学掷野球而练会抛炸弹，以为将来发难的准备。当时正在暑假期中，大多数学生已经回家，但参加的仍很踊跃，经常在教育会坪练习的就有八十人左右，其中以明德学生

居多数。野球会办起不到一个月，就有人向官方告密，说是“革党”阴谋活动。端方由湖北来电通缉，唐蟒列第一名，我列第二名。这时，外间风声很紧急，幸得陈树藩（陈嘉任之父，时任湖南谘议局副议长）的维护，我们才匆忙逃离长沙，仍赴日本。

武昌首义后不久，胡元倬由日本回国（任留日学生监督），谋扩充明德学校；到上海时，曾与先君会面。后来他在所写《题黄克强先生遗墨》一文中，谈到这次的会见，说：“辛亥革命事起，克强自武汉苦战力绌来沪，倬见面笑曰：‘成功矣’。克强曰：‘我败来，何出此言？’倬曰：‘君非军事学家，败乃常事。前者君一人革命，故难成功，自黄花岗事出后，全国人心皆趋向革命，自成功矣。’”据我所知，南京临时政府酝酿成立时，先君原准备推荐胡元倬出任教育总长，后以胡不愿做官，决志回来主持明德学校，遂作罢论。

胡元倬办明德学校几十年，毕生精力，尽瘁于是。除了因范源濂的再三敦促，做过几个月的留日学生监督外，从未担任过其他官职。他每对明德学生演说，常说：“克强先生在日，我对他说，流血革命险而易，磨血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事业，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他在晚年刻过一颗图章，曰“磨血人”，即取教育磨血之意）。

一九一二年夏天，胡元倬去北京，行前有信给先君，商议扩充明德学校，筹办大学。当由先君领衔，呈准北京教育部设立明德大学于汉口，并领得补助费八万元。后以武汉地区兵燹之后，元气未复，而北京人才荟萃，容易聘请教授，就于第二年春改设明德大学于北京，赁干面胡同房屋为校舍，设商科及政治经济科，聘章士钊为校长。是为明德有大学之始。

先君以一九〇四年十月由明德出走，一九一二年十月自上海

回湘省亲，曾往西园龙宅叩访，并到明德学校访问。当时全体师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这次访问，是先君出走八年后的第一次回到明德，也是最后的一次。

本文草就后，接周震麟先生来信，提供了几点补充材料，极为珍贵。现在附录如下，以资参证。

(一)刘佐辑(柱丞)，湖南醴陵人，壬寅年湘抚俞廉三选送留学日本弘文师范的十余人之一(与胡元倓同学)。龙璋、龙绂瑞、胡元倓创办明德学堂，刘也是发起人之一，并出资二百串文。他是王先谦门人，王先谦顽固地反对办学，要他打进来专门刺探革命师生的言行，随时密报王先谦、叶德辉等。胡元倓和龙氏兄弟最初不知道他的阴谋，满以为他热心办学。刘因思想落后，不受学生欢迎，没有任教。同时我从戊戌庚子维新志士方面，得知刘曾经告密出卖他的老师李莲舫，被清政府迫害，要明德师生对他提高警惕，因此，刘急欲掀起风潮，排除我离开明德。他和我的斗争，体现了明德的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斗争。

(二)通过王先谦向湘抚赵尔巽告密的人是单启鹏，安徽省人，他是第一期留日士官学生，当时在长沙担任武备学堂教习。他的兄弟单启鸿在明德肄业，表面伪装倾向革命，暗地里受乃兄委托，把我们一般革命教师对学生宣传革命的讲话，都一一记录在教科书的书楣上，交给启鹏，由启鹏持报王先谦。最后是启鸿把陆鸿逵对他的历史课卷上我手批的奖励语交给启鹏(陆教历史)，启鹏交给王先谦，由王先谦袖着这本卷子向赵尔巽告密，说明德的师生昌言革命，要求审讯严办。由于管学大臣张百熙和湖南的学务处总办张鹤龄都是极力维护我的，事情没有扩大，但明德学堂这时却岌岌可危。

赵尔巽为此事曾召集全省巨绅在巡抚衙门花厅开会，我和陆鸿逵以及单氏兄弟都被召参加。开明士绅都袒护我，说我“思想纯正”。陆鸿逵说“批语是单生捏造诬枉我的”。最后赵作结论：认为我是教地理的，不可能批阅历史课卷，斥责单启鹏教弟不严。当场开除了单启鸿的学籍，交启鹏领归，严加管教，要我仍旧担任教习。一场风波；如此结束。

（三）胡元倬、龙致瑞因系明德正副负责人，为了维护学堂，都没有加入华兴会。

（四）我和刘佐楫、单启鹏的斗争虽然胜利了，但认为自己留在明德，是王先谦等顽固派的目标，对革命事业不利，因此，坚决辞职。当时革命学生不同意。经我再三解释，并商之胡元倬等，由克强先生亲自出面，主办速成师范，并另外成立经正学堂（刘佐楫不参与经正学堂的行政和教学）。从此各省的革命党人，来明德、经正任教的日多，参加和赞助华兴会的秘密革命活动，并从而与各省革命党人取得联系。我虽然名义上离开了明德，和十二个革命学生创办了修业学堂和宁乡中学，但事实上以克强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仍以明德学堂为中心（刘佐楫被明德师生排斥，不久离开了明德），积极展开活动。

（五）吴禄贞在湖北参加了自立军的庚子之役，失败后赴日本留学士官。当克强先生在两湖书院读书时，吴经常来访，交谊甚笃。克强先生在明德、经正办学时期，曾约吴来湘教体操，但抵湘不久，就被调到北方训练新军去了。与吴来湘同时，李书城也曾来明德小住，与克强先生商讨秘密进行革命运动。大概吴、李都在这时加入了华兴会。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回忆在明德学堂执教时的黄克强先生

阎幼甫

1961年10月，明德学堂的老同学黄一欧老弟来京参加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谈及他应湖南省政协之约，拟写一篇《黄兴与明德学堂》的资料，要我提供一点材料，以资印证。故草此篇以报命。所述仅为克强先生在明德学堂的教学生活的片断，作为一欧文章的补充而已。

黄克强先生于1903年夏秋之间到明德学堂任教员，掩护其革命活动。黄先生原名黄轸，号廬午，当时明德学堂的同事和学生以及社会上都称他黄廬午老师。1904年冬，汉口某报载：官军捕获马福益头目多人，供称曾到普迹和安源开会的，有黄廬午老师和宁太爷两人（“宁太爷”就是宁调元，明德中学第一班毕业。宁调元字太一，“爷”系“一”之讹传）。“黄廬午老师”这个名字，是为当时的青年学生所爱戴而为清朝官吏所畏惧的。笔者在本文中，仍按习惯称克强先生为黄廬午老师。

当时在明德学堂任教的老师有黄廬午、杨德邻（性恂）、李步青、王达、沈迪民、张继、汪根甲、张康侯、蓝欣禾诸先生；教体操的有蒋隆第、朱桂辛和徐、雍两位。黄廬午老师最爱和体操教员一道畅谈和练习兵式体操，并多次在校内接待穿着得胜马褂

(一种酱色宁绸的短褂，胸前上下两方和两侧衣衩及后衩都镶有青色缎云勾，又号五云褂)的陶仲登管带(二十五混成协的军官)和刚到长沙不久的蔡教习(就是蔡锷)。当时我们只觉得新鲜、突出，根本不了解他的用意。后来才知道黄庶午老师爱交体育教员和军人，原来是想在这些人当中为革命物色军事人才。

黄庶午老师在几个学校都兼了课。他在明德小学担任的课程为地理和博物。黄老师教地理，对地图非常注重。上讲堂时，总是带着一个比足球还大的地球仪；一面讲课，一面拿着教鞭往挂图上指点说明；有时把学生叫到讲台前面，让他们在地球仪上仔细观看；并强调填暗射图的重要。他的讲解生动，引人入胜。后来换了王达老师教这门课，同学们就松懈得多，有时甚至在课堂上打瞌睡，不象听黄老师教课那样聚精会神了。

记得有一件有趣的事——题地图。小学生每人发了一本地图。有一天，一个同学拿着地图到教员休息室去问黄老师(黄老师不住在校里)，顺便请他在地图上题几个字做纪念。黄老师提笔写上“空怅望，山川形势，已非畴昔”，末署“近午”两字。同学们看见了，纷纷拿着地图要黄老师题字。黄老师有求必应，大概全班学生的地图都给题了字。他在我那本地图上写着：“若人如马亦如班，笑履壶头出玉关”。我不懂解，就问老师。黄老师解释说：马是指马伏波(马援)，班是指班定远(班超)；壶头山就在沅陵和桃源相连的地方，马援曾在壶头山驻过兵；玉关就是玉门关，班超扬威西域，就在玉门关外。当时同学们都把经黄老师题字的地图当作宝贝一般。至今我还记得黄老师所题的有下列一些句子：“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汉家烟尘在东北”、“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今也日蹙国百里，呜呼哀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从这些题词中，充分表现了黄老师的

爱国思想和革命热情。

黄廛午老师所教的博物，在小学是先教动物学。有一天上博物课，黄老师双手托着一个大面盆走入讲堂，将面盆搁在讲台上，原来盆里养着一条一斤多重的活鲤鱼。他开口就说：“今天同你们讲鲤鱼跳龙门。”他说：我国古时候有些人对动物学也有研究，可惜不够深入，常常发生错觉。很早以前，中国人就知道鲤鱼从头至尾有三十六鳞，这只是表面上的研究。至于所谓“鲤鱼跳龙门”，意思是说，鲤鱼跳过龙门就成了龙。其实过细考察，这种神话是极其荒谬的。原来龙门滩险水急，鲤鱼在产卵时总是逆流而上，游到了龙门附近，便用劲往上游纵跃，跳过龙门以后，还得继续前进，为繁殖后代而努力。鲤鱼终究还是鲤鱼，决不会成龙的。只因为从前造反的人，都想做皇帝，所以捏造出“鲤鱼跳龙门”和什么“龙章凤姿”、“真命天子”之类的骗人的神话，为的不过是个人和家族的荣华富贵。历朝都是赶走一个皇帝，又来一个皇帝，对百姓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法国的革命党人就聪明一些，他们在革命成功以后，将政体改为民主共和，实行自由、平等、博爱，再也不要皇帝了，所以大家能过幸福的日子。黄老师将鲤鱼的背鳍提起，对学生讲述胸鳍、尾鳍、鳞、鳃等名称和作用；还说下课后再解剖内脏给大家看。

黄廛午老师是个博学多才的人。常见他在周家花园池塘边一个小亭上和教员们谈天，同文史教员就谈历史或诗词，同理科教员就谈博物，同体操教员就谈操法。他和地理教员王达老师谈话很多，大都是讨论地理教学上的问题，有时还出些题目要王达老师去找材料。他们时常发生争论，每次争论的结果，好象总是王达老师服输。学生们都说王老师怕黄老师。有人问王老师：“你为什么那样怕黄老师？”王老师说：“黄廛午老师是我在两湖书院的老

学长。我之所以专门研究地理，还是得力于他的启发。我是尊敬他，并不是怕他。”

黄老师身体健壮，喜爱体育运动。下课以后，他总是在球场和操场活动。凡是踢足球、翻杠子、跑圈子，多半有他参加。黄老师经常穿着一件浅紫色的纺绸长褂。因为运动多，出汗也多，汗透了的长褂，湿处变成了蓝色。有一次，明德师范第一期毕业照相，黄老师的长褂被汗湿透了，照出来的相，就象胸前打了一个大补钉。

黄老师和学生跑起圈子来最有趣。当他和中学生一道玩的时候，顽皮的学生看到胖子老师被人追赶得急，故意将空档挤紧，不让他通过，望着受窘发急的老师拍掌发笑。当他和小学生一道玩的时候，小学生对待老师就不是这样。每次轮到黄老师跑头，如果被追得紧迫，他们就把空档放得很宽，使老师能够顺利地进入圈内藏身；有些人口里还喊：“老师，快换人！”沈老师看到黄老师比较欢喜和小学生玩，说：“这一定是因为小学生跑得慢些。”黄老师说：“小学生跑得快的也不少，我是因为他们表现比中学生更加天真可爱，所以欢喜和他们一起玩。”

有一次，黄廑午、杨性恂、沈迪民三位老师在小亭中谈天。我发觉他们是在谈革命的问题，便停步在旁静听。杨老师对着我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你们将来可以坐享其成。”黄老师一边望着我对杨老师说：“革命恐怕不会很快成功，他们还是要参加披荆斩棘的！”黄老师说这话七年以后，就爆发了黄花岗之役。同学中年龄刚十九岁的黄一欧跟着他的父亲克强先生参加了那次起义。阎鸿飞、万定球、宾镇远等后来都在各地参加了辛亥革命，并且当了革命军人（黄一欧、万定球、宾镇远和我四个人都是明德学堂的同学，后来都当了军人，黄在上海光复后任沪军副司令，

万曾任北面招讨使谭人凤部下的标统；宾曾任鄂军协统；我在武昌首义后任过湘鄂义军总司令和湖南军务部长)。“还是要参加披荆斩棘的”一句话，真是语重心长，感人至深。事隔六十年，回忆前情，恍然犹在周家花园小亭侍座时也。

回 忆 秋 瑾

王 时 泽

前清光绪末叶，我与秋瑾在东京相处两年，同在横滨加入三合会。现在回忆起她那种风姿英发的形象，有几件事还是记忆犹新的。

一九〇四年（清光绪三十年甲辰）阴历正月十八，我随湖南第二批官费留学生由长沙经上海赴日本。二月初到东京，官费留学生田星六等二十余人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我是自费生，进了弘文学院普通班。弘文学院是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专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普通班按地区编班，我编在湖南班。在湖南班的同学，现在记得的有长沙杨昌济、陈朴，湘潭李锐、胡迈、胡彦博等。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中国留学生会馆设在东京神田区骏河台，各省留学生都有同乡会的组织，在一省之中，有的还组织了地方同乡会（如湖南的湘西同乡会）。各种同乡会经常举行集会，参加者极为踊跃，并出版了一些刊物，如《浙江潮》、《河南》、《湖北学生界》以及湖南的《游学译编》等。湖南同乡会经常每月要开一两次会，大多租赁神田区锦辉馆为开会地点。在湖南同乡会开会的时候，我认识了刘道一。道一号炳生，系刘揆一之弟，当时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风度翩翩，口舌敏辩，在同学侪辈中非常活跃。我们年纪相若，一见如故，彼此过从极密。我初到东京时，住在牛込区道德馆（后来迁往神田区矢泽馆），道一

每两三天必来一次，来则放言高论，往往废寝忘食。

一九〇四年夏，秋瑾冲破封建樊笼，到日本留学，进了中国留学生会馆办的“日语补习所”补习日语。秋瑾是浙江绍兴人，每遇浙江同乡会开会，她必定参加。又因自幼随父入湘，与湘乡王廷钧结婚，故每次湖南同乡会开会时，她也都来参加，很快地就和刘道一、仇亮、刘复权等人相结识。我也是在这时候和秋瑾订交的。她虽然比我大九岁，但彼此意气相投，聚谈的机会很多。从谈话中知道她性情坚强豪爽，幼年时，从其父学通经史，工诗词，又好剑术，善骑马，十九岁与王廷钧结婚。廷钧之父在湘潭由义街开设义源当铺，积资巨万。婚姻是她父亲在湖南作州县官时所订的，迫于父母之命而非她所心愿。其咏谢道韞诗中有“可怜谢道韞，不嫁鲍参军”之句，可见她对于婚姻的不满。一九〇一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以后，大开捐官之例。王廷钧于一九〇二年进京捐官，秋瑾随他同游北京。当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她目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猖獗横行，清朝政府的昏庸腐朽，忧愤填胸，决然以救国为己任。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又加以京师大学堂日籍教授服部博士之妻极力称道日本女学之发达，就决计突破家庭阻力，东渡留学。

就在和秋瑾认识后的这年秋天某日，刘道一来到我的住所，说，现有孙中山所派的冯自由、梁慕光等在横滨组织革命团体，以推翻清朝、恢复中华为宗旨，秘密邀集同志参加。道一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表示同意。这个团体叫什么名称，此外还邀了哪些人；道一当时没有对我明说。过了两三天，我们即由东京乘车到横滨。我住在李植生家里（李系广东博罗人，精工化学，善制各种炸药，在横滨教留学生制炸药时，我曾从其学习），道一则住在冯自由家。冯自由见我们来了，表示非常欢迎，并约定某日晚饭

后在南京街（横滨一条街道的俗称，中国人聚居于此）某广东商店后进举行入会仪式。到了预定时间，入会的人陆续来到，共计十人。除我以外，还有秋瑾、刘道一、仇亮、刘复权、彭竹阳、曾贞、龚宝铨等（其余两人，忘其姓名）。冯自由、李植生、梁慕光都在场。首先由冯自由向我们交代宣誓的问答语，叫我们在宣誓时依样回答。交代完毕，即由梁慕光主持宣誓仪式。他手执钢刀一把，架在宣誓人颈上，由各人依次宣誓。刘道一是第一个宣誓的。轮到我宣誓时，梁问：“你来做什么？”我照冯自由嘱咐的回答：“我来当兵吃粮。”问：“你忠心不忠心？”答：“忠心。”问：“如果不忠心，怎么办？”答：“上山逢虎咬，出外遇强人。”全体宣誓毕，梁与冯自由横牵一幅六七尺长的白布，上书斗大的“翻清复明”四字，命各人俯身鱼贯从布下穿过，以示忠于主义。又在室内烧一堆火，命各人从火上跳过去，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然后分别刺血，杀了一只大雄鸡，共饮雄鸡血酒。冯、梁两人当场宣布这个团体叫做“三合会”（取合天合地合人之意），向我们交代了一些规矩，如见面手势如何摆，如何问话答语，进门要用右脚向前跨，握手时要捏紧对方的无名指，等等。并交了一本书给刘道一，叫我们互相传抄。我粗略地翻了一下，里面写了一些会规，还画了许多旗帜的样式。最后，每人交纳入会费十元日金，就算了事。这次入会，刘复权被封为洪棍，秋瑾被封为白扇（俗称军师），刘道一被封为草鞋（俗称将军），是谓“洪门三及第”。刘复权，湖南人，后来变节投敌，流为江督端方的侦探，辛亥革命时为民军捕解南京，经黄兴下令枪决。仇亮字蕴存，湖南湘阴人，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后入振武学校习军事，寻升士官学校，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部军衡司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北京被袁世凯逮捕下狱，一九一五年六月九日遇害，年三十七

岁。龚宝铨字味荪，浙江人，章太炎之婿，随太炎研究国学，造诣甚深，辛亥革命后任浙江图书馆长。曾贞字骥才，江西人。彭竹阳，四川人。

按横滨三合会又称三点会，成立于一九〇四年春。第一次入会者为冯自由、梁慕光、廖翼明、胡毅生、陈擷芬(女)、李自平(冯自由之妻)等人。自平与秋瑾相友善，秋之入会，即自平所邀约。我们这次是三合会的第二次拜盟。据冯自由说：当时革命党尚无统一组织，孙中山在海外结纳同志，常利用三合会的形式行之。一九〇五年八月，同盟会成立于东京，我们遂正式加入同盟会。秋瑾是在同盟会成立半月后，由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入会的。她加入同盟会后，被推为浙省主盟员。后来浙江志士入会者，多为她所介绍。

自从横滨加盟回到东京后，秋瑾和我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她视我如弟，时加勉励。并介绍我和陶成章见面，约为同志。陶成章当时在江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与章太炎、蔡元培等组织光复会。秋瑾因其亲成陈静斋的关系认识了陶成章，又因陶的介绍而加入了光复会。我和刘光汉认识，也是秋瑾介绍的。刘系江苏仪征县人，字申叔，当时在东京由其妻何殷震出面，创办《天义报》，并著有《攘书》，鼓吹革命，后来竟变节了。秋瑾在东京时，喜欢结纳革命志士，交游甚广。当时中国留学生很多，流品不齐，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两大阵营，壁垒非常森严。秋瑾站在革命方面，对于志在反清排满的爱国青年引为同志，滔滔雄辩，无话不谈；对于那些浮薄轻佻，专讲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则深恶痛绝，不相往来，有时还当面呵斥，毫不留情。对于那些顽固透顶，借留学为升官发财途径的人，她也最痛恨，自始至终口诛笔伐，或面对面地展开斗争。如有个浙江留学生胡道南，因谈论排满革命与

男女平权问题，彼此意见不合，发生争执，秋瑾当面骂他是死人。胡因此怀恨在心。一九〇七年秋瑾在绍兴大通学校被捕，就是他向绍兴府知府贵福告密的（当时胡任绍兴府学务处总办）。

秋瑾在东京的时候，看到革命形势一天一天的发展，积极准备着回国从事武装斗争。平时她常穿日本的“和服”，并且买了一把“倭刀”，经常携带在身边。她常到东京麹町区神乐坂“武术会”去练习射击技术，又学习过制造炸药。我在横滨李植生处学制炸药的笔记，她全部借去抄录了。

一九〇五年暑假期间，我由东京回国省亲。当时我父亲在四川打箭炉游幕未回，只有我母亲住在长沙。先母以我年少阅历不深，过去在善化学堂闹事被开除，怕在日本又出问题，因此很不放心。我将在东京的求学情形详细禀告，并说“来往很方便，你老人家不妨亲自去看看。”得她同意，于是我们母子二人一同到了东京。这时秋瑾已在日语讲习所结业，由国内省亲归来，入青山实践女校附设师范班学习（这个师范班是范源濂与实践女校校长下田歌子所发起的，修业期限为一年，除国文教员章士钊外，其余教员均系日本人，用翻译上课）。秋瑾见我母亲来到，热情接待，态度和善可亲。她对我母亲多次谈到男女平权、女子要受教育的问题，怂恿先母留在日本和她一道求学。恰好其时湖南选送的官费留日女生许黄萱祐等二十人也都进入师范班，同乡人多，又有秋瑾力劝，我母亲就决意留在日本读书了。她原名谭莲生，入学后由我代她改名王勳。在实践女校师范班中，她是第三个年纪大的学生（湘阴人聂某四十九岁，许黄萱祐四十四岁，我母亲四十三岁，同学昵称为“三伯妈”）。我母亲的年纪比较大，身体又不大好，秋瑾对她照料很周到，遇到劳动的事，总是抢先代做，尽力而为，不让我母亲操心费力。我母亲多次向我谈到，秋瑾在

校顽强苦学，毅力惊人，每晚做完功课，人家都已息灯就寝，她仍阅读、写作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待到我母亲再三劝导，才停笔上床。现在收入《秋瑾集》（一九六〇年中华书局版）中的诗词文稿，有许多就是这时期写的。

实践女校师范班仅办一期即未续办，湖南派遣官费留学的二十人，我现在记得起来的有：许黄萱祐（长沙人，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学监督，并创办私立隐珠女学。一九五三年病故，寿九十二岁）、许馥（长沙人，范旭东之妻）、许徽（长沙人，仇亮之妻）、吴珊（湘潭人，胡迈之妻）、张汉英（醴陵人，辛亥前后从事妇女运动）、王昌国（醴陵人，曾任省议员、务本女校校长）、许璧、黄国厚、黄国巽、黄辉、彭渊恂之妻（忘其姓名）等十一人。此外，自费附学的约十人，秋瑾、湘阴聂某和先母等都是。每期须缴学费十六元，加上衣服、书籍、纸笔、零用等费，每月需三十元之谱。据我了解，上述诸人中，现存者有：黄国厚（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许馥、吴珊（均居上海）等三人，存亡不明者为黄辉与彭渊恂之妻。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日，日本文部省公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学界异常愤激（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达七八千人），无形中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立即退学回国，另在上海办学，以洗日人取缔留学生之耻辱；一派认为既来求学，即宜忍辱负重，学成然后归国。双方各执一词，互有辩驳，争论至烈。我那时倾向于后者，而秋瑾与陈天华、田桐等人则都是力主迅速回国的。这年十二月八日，陈天华愤不能平，竟写好一封绝命书，劝告留日同学坚持爱国主张，奋斗到底，自己则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自陈天华投海后，秋瑾受了很大的刺激，决计立即回国，自谋出路。在陈天华投海的第二天（十二月九日），她就写了一封信给大

哥秋誉章，告以留学界因取缔规则公布，“俱发义愤，全体归国，此后请勿来函，大约十二月须归来也。”同月二十二日，又寄书秋誉章说：“近日留学界全体同盟停课，力争规则之辱，……决议全体归国，故纷纷内渡已及二千余人。妹亦定此月归国，以后再作行止”。在我的记忆中，秋瑾是在一九〇五年年底以前由东京动身回国的。临行前某天，是星期日，她同我母亲一道来到我的住所（当时我在日本私立海军预备学校——海城中学学习，为照顾我母亲起见，特迁至赤坂见附町见晴馆寄宿），问我归国与否？我说：“甲午之耻未雪，又订辛丑和约。我们来到这里，原为忍辱求学，我不赞成在此时回国，并希望大家暂时忍耐，不必愤激于一时。”秋瑾见我这样回答，没有表示反对意见。过了几天，她就束装回国了。

秋瑾回国后，不久就寄了一封信给我。现在抄录如下：

吾与君志相若也，而今则君与予异，何始同而终相背乎？虽然，其异也，适其所以同也。盖君之志则在于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义不受辱以贻我祖国之羞；然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吾素负气，不能如君等所为，然吾甚望诸君之母忘国耻也。

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荃、史坚如、吴越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

这封信是由上海寄到东京的，信尾具名是“兄竞雄顿白”（她

归国后给我的信都是这样具名的)。信中所说：“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又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这几句话，反映了她经过在东京两年的锻炼，深明革命大义，决心以实际行动挽救祖国的危亡，即牺牲生命亦所不惜，忧国忧民的沉痛心情，溢于字里行间。我读了以后，深受感动。

后来知道，秋瑾回到上海，住在虹口厚德里，结识了许多革命同志，经常秘密商讨革命问题。并于一九〇七年一月，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份女报——《中国女报》。她自己撰写了《中国女报发刊辞》，又用白话体写了一篇激昂慷慨的书告——《敬告姊妹们》。秋瑾在办报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武装斗争。她与徐锡麟保持密切联系，积极筹组“光复军”，定期在皖、浙两地起义。一九〇七年春天，秋瑾回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体育专修科。大通学堂实际是一个军事学校，名为学习体育，实则借此培养军事人才。秋瑾常常穿了男子服装，骑着马，带领学生到野外打靶，练习射击技术。这时，她也不断有信给我，说了许多劝勉的话，并将所著《精卫石》文稿寄来，托我在东京出版。我正准备交印，她又来信索回，说要修改内容。后来就没有再寄来了。最近看到《秋瑾集》中刊载的《精卫石》是弹词，我记得她那时寄来的是曲牌，可能是索回之后修改的。就在这年春天，秋瑾回到湘潭王家视其子女，并告其夫说：“我已以身许国，今后难再聚首，君可另择佳偶，以为内助。”居住几天，即行返浙。她这次去湘潭，往返经过长沙，都住在我家（通泰街忠信园）。我的六岁侄女孟明，看见她穿的长袍马褂，一派男装，称之为“秋伯伯”。其时我母亲已经回国，在周南女校教课。

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三日（阴历六月初四），秋瑾在大通学校被

捕，同月十五日，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年三十岁。其遗骸由女友吴芝瑛、徐寄尘等收拾，葬于杭州西湖西冷桥畔，墓碑题为“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翌年，清御使常征奏请平毁秋墓，并严拿惩办吴、徐两女士，因社会舆论群起反对，吴、徐幸免株连。烈士遗骨，由王廷钧以其子沅德名义，迁葬于湘潭之昭山。烈士死后次年，陶成章等密遣同志，诛胡道南于绍兴某寺。胡之告密，事载《秋女侠冤狱汇案》中所收费福于六月初五致浙抚张曾敫禀；胡被诛经过，是陶成章辛亥前在东京亲自告诉我的，但陶自己所撰的《秋瑾传》却没有提到这件事。

一九一一年六月，我母亲在长沙病故；翌年五月，我由上海回湘奔丧。其时湘浙两省商定，迎送烈士遗骨返浙，复葬西冷桥畔。长沙辜天佑带领烈士之子沅德来见我，说王家认为烈士子女均在湘潭，不赞成迁葬西湖。经我婉加解释，始无异议。这时又有部分同盟会员主张改葬岳麓山，我也力持不可，因为烈士出生于浙江，就义于浙江，自以复葬西湖为宜。烈士忠骨复葬西湖后，湖南妇女界及同盟会呈准都督府拨长沙市黄泥墩陈提祠改建秋女烈士祠，并推我经办这件事，经费则全部由王家负担。我除主持建祠事宜外，并将辛亥前陶成章在东京交给我保存的烈士诗文稿（我当时又寄回长沙，交先母保管）编为一集，以“长沙秋瑾烈士纪念委员会”名义出版，题名为《秋女烈士遗稿》，我在卷首写了一篇《秋女烈士瑾传》，略叙烈士生平及死难经过。这个集子印数不多，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秋瑾的儿子王沅德，号重民，一八九六年生，上海正风大学毕业。曾任报社经理、中学教员等职，解放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秘书，一九五五年在长沙病故，年五十九岁。沅德临危时，嘱家人将所存他母亲的遗照数帧并《秋女烈士遗稿》一本送到我家（我

已转送湖南省博物馆保存)。

岁月不居，秋瑾殉国已有五十四周年了。当年横滨三合会同志，大概都已不在人间，回首往事，真是“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鲁迅诗)。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供稿)

四十九标辛亥援鄂始末

余 韶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辛亥九月初一)，湖南起义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援鄂。这是两湖革命党人预先约好的，也是湖北方面迫切希望的。十月二十六日，四十九标二营左队代表丁炳尧、右队代表王奋武和二三党人在都督府，听说要出兵援鄂和巡防营管带甘兴典请愿要去的消息，很兴奋地跑回营来邀各代表到标部开会，说：“现在就要出兵援鄂啦，巡防营甘兴典想去，我们该怎么办？”左队正目骆兆荣首先发言说：“援鄂应该让新军去，新军又只有我标容易集中（是时五十标分驻益阳、常德、醴陵、攸县，四十九标一、三两营正在湘鄂边境），应该让我标去。”有人说：“我们四十九标不可落人之后，请标统快去都督府请示，我们一定要去援鄂。”又有人问：“昨天升了官的人怎么办呢？”大家酝酿之后说：“队伍莫扩充了，官莫升了，打完仗回来再讲。”于是全体通过，立刻分往各队传达。

原来在这头一天(十月二十五日)，四十九标已经奉命招募新兵扩充队伍，正副目升了连排长。听了到会代表来队传达标部会议经过后，全体目兵随即一致表示愿意援鄂。我是左队四棚副目。左队是刘光荣同另一个党人（我不认识）来传达的，他们激动地说：“标统已经向都督府告了奋勇！大家升了官的愿不愿意自动放弃呢？”正副目们都不约而同地说：“官不要了，仍旧当头目，

到湖北打仗去！”这时大家已经意识到不打垮清军，推翻专制，革命的果实是保不住的，所以都不计较那新升的官职了。

各代表得到各队表示后，马上去报告标统王隆中（前标统黄鸣奉派往北洋阅操去了，王隆中是首义这天以教练官升任标统的）。王隆中得报，忙去都督府请纓。焦达峰、陈作新极其赞许，立刻决定四十九标首批援鄂，即日用船舶输送。命令还没下来，我们第二营全营都晓得了，赶忙准备出发。有多余的衣物和新买了指挥刀的忙送回家去，没有家的存放队部储藏室。六棚刘静安由外面回来说：“别的队上要取消军帽，改扎包巾。”三棚正目刘光荣抢先赞成说：“扎包巾打仗便当些。”多数人一附和，就有些人上街买青布或绉纱做包巾。我原是不甚同意的，但也只好勉从众议，上街买了一条绉纱包头。

二十七日下午，我们第二营在大西门上了民船（大盐船），一阵子将辫子剪掉了。王隆中升了第一协协统，三营管带卿衡升任标统，鲁涤平升了管带。但是并未扩充部队，仍然只有四十九标一千七百多人；王隆中仍住标部。次日早晨开船，绅商学各界和各机关都派有代表到江岸放炮竹欢送，都督府的代表是危道丰。各队的船在炮竹声中依次离岸顺流东下。目兵们以舒畅的心情坐在船舱里，有的在练习扎包巾，有的在用通条油布擦枪和子弹。

十月三十日傍晚，我营的船到了岳州。这天是重阳节，许多人忙着上岸找东西吃，欢度佳节。在岳州休息三天。本标一、三两营（三营欠前队）都来了，看见二营的人辫子都剪掉了，已改扎包巾，他们也就很快地照样把辫子剪掉。一营管带梅卓敏逃跑了（一说王隆中准了他的假），由督带官梁锡球升任管带。十一月二日，有背叛了革命的一个标从湖北逃来岳州，经我一、三营将其缴械遣散，他们没有抵抗。后来听说守卫汉阳兵工厂的鄂军宋

锡全协，当汉口战事吃紧时率部逃入了湖南，我们解决的那一部叛军，不知是否就是宋部。

这时湖北派了一艘轮船到岳州来接运队伍。十一月三日，我们续向武昌进发，一、三两营是乘这艘轮船走的，二营是坐民船用小火轮拖带的。到达武昌后，全标驻在两湖书院。第二天移驻江边甲乙丙栈。湖北军政府犒赏每队猪肉一百斤。

十一月八日，全标开到两湖书院听黎元洪都督训话。八时左右，王隆中陪着黎元洪、黄兴和几个高级幕僚来了。黎骑一匹酱色大马，穿着黄呢军服，黄皮马靴。阅兵后接着讲话。黎的声音洪亮，讲话内容记不全了，大意是：自从清朝鞑子窃据中原，我们汉族做了两百多年的奴隶。现在是我们复兴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推翻清室，还我河山。你们四十九标是训练有素的军队，在湖南起义立了大功，现在又来打清军是很好的。我看到你们大家身体壮健，精神饱满，一定能打胜仗……。

当时有人告诉我，站在王隆中上手那个穿青呢衣服，相貌魁梧的人，就是黄兴。这天他没有讲话。

四十九标是训练了七八年的军队，步伐当然比较整齐，军容比较雄壮，两次进出武昌城，两傍看的人很多。有人啧啧称赞地说：“好队伍！好队伍！”也有人说：“这才是来打仗的队伍！”其实惭愧得很，后来两次的仗都没有打好。湖北方面最初以为王隆中是一个协，会有四、五千人，实际上我们将标改协后，队伍还没有来得及扩充，只有原底子一千七百多人，就出发了，武器也只有步枪。标部本有的几挺重机关枪，也留在长沙没有带来。

十一月九日，全标渡江至汉阳，驻黑山十里铺一带，标部驻许家湾。因为祠庙空屋不够住，又不愿占民房，只得把一部分露营。军政府发来饼干、蜜橘很多，我们吃了几天才吃完。第二营

担任汉水两岸向汉口警戒。我担任独立军士哨长，在河边小树丛里向对岸观察很久，毫无动静，连老百姓也冒看见一个，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右队副目胡秋廷也在我左翼放哨，我邀他一同过河去看看。他说：“莫急，先让我用驳壳枪试射一下看。”他向对岸打了一排子弹，对面一个草堆中钻出两个敌人退上岸去了。胡秋廷说：“这不比过河去好吗。”

骆兆荣只想去抢敌人的机关枪。他和何得清等几个力气大的人商量，用钢板打成盾牌，一人持盾，一人持枪去接近敌人。他们画了一张图样交队部派人去打，队部打了三面来一试，重了拿不动，轻了挡不住子弹，而且只能掩护一个人，结果未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日兵们对作战是有决心的。

二营管带王振宇，身体笨重，行动迟缓，又有点道学气，对行军作战本来有点吃不消。他和督带官李宗彭一同骑马到标部去，王前李后，李嫌王的马走得慢，在后面抽了一鞭子。王的马受惊一蹶，将王摔在地下。王振宇落马之后，非常懊丧，他想：这不就是马失前蹄出军不利么？他借口跌伤了，向王隆中请假，并怪李宗彭有意谋害，想取自己而代之。王隆中的处理很简单：王振宇请假照准，李宗彭撤差，由左队队官杨万贵升管带。

十一月十二日，湖南二批援鄂军第四协甘兴典部到达汉阳。他们是临时编凑的，新兵极多，军容欠整。约在同时，徐鸿宾带来的敢死队二百余人到了汉阳江边，本标第三营前队也来归还了建制。

驻军汉阳以后，连日听说有汉奸来此刺探军情，他们用三个铜钱一条红布缝在衣襟底下为记。王隆中生性好酒好杀人，据说这次被他杀掉的“汉奸”有七、八十个。不知怎么，有一次甘兴典部有个叫李关基的，原在本标三营当过副目，也被误会抓进标

部，王隆中就喊要杀。幸三营靠得近，有些目兵去讨保，才免一死。

我们在汉阳警戒了几天。十一月十五日，黄兴总司令下令进攻汉口，以甘兴典协为左纵队，四十九标为右纵队。十六日下午出发，黄昏时在三眼桥过浮桥，乘夜向汉口前进。因为连日下了雨，道路泥泞，行动困难，十多里的路竟摸了一夜。拂晓时到达常风垆大堤的北面，全标沿堤展开。这一道长堤以南，是一大片平坦开阔地，毫无遮蔽物，靠近汉口市郊才有些小房屋短墙篱笆之类。敌军阵地的前沿和翼端都冒侦察得出。王隆中一不区分各营队任务，二不指定攻击目标，区分战斗地境，就喊“冲过去！”各营队越堤跑步前进，不到二百公尺，敌人机枪齐发，纵横扫射，弹如雨下。我全线目兵都伏倒地下，等敌人的机枪一停，又都立起跃进；如此数次冲到小屋短墙篱笆之线，距敌约一二百公尺。我第三营冲到面粉公司附近，正应继续攻击，突破敌阵时，却反而都停止了。原来官长们没有指挥，完全由目兵们各自为战。与敌相持至下午三时许，左翼甘兴典部开始动摇，纷纷溃退。本标第一营被其牵动。四时后，全标都撤退了。我退到大堤上，抱着好奇心停下来，想看看敌军究竟怎样的前进。等了一会未见敌军追击。迨我退到三眼桥时，浮桥拆了，还有几个别队的兵在那里，我们找了一只小船过河。当时听说东岸上游一里许山地里尚有我一营两个队守在阵地，掩护我军撤退。

这一战役失败的原因是：一、无计划地轻进；二、甘部新兵多，首先溃退，影响全局；三、王隆中既不指挥官，官亦不指挥兵，形成各自为战。此役我标伤亡约二百余人，三营管带鲁涤平、三营前队排长王云山、司务长李炎光等都负了伤；我队阵亡目兵骆兆荣、李希能、唐福生、李春生、邓炳耀、魏鸿亨等十多人。

王隆中退回许家湾标部，莫知所措，只是哭泣。

十一月二十日，敌军一个混成协由蔡甸琴断口来犯，我标第一营在琴断口警戒的两个队，抵抗约二小时撤退了。敌乘势向美娘山、锅顶山、扁担山前进。本标奉命占领汉水以南的金龙山高地拒止来犯之敌。杨万贵挑选敢死队数十人，协同鄂军某管带向敌反攻，不顾敌军机枪扫射，奋勇前进，由西侧攀登美娘山顶，将敌击溃，斩获颇多。我队阵亡正兵李广田、李能平二人。敌复增加优势兵力来攻，我敢死队以众寡悬殊，只得撤退，美娘山又得而复失。

二十二日，敌步兵数百在机炮掩护之下向我第三营猛攻，似欲向我中央突破，被我三营击退，打死打伤敌人很多。这次以三营前队战斗为最激烈。排长岳超、正目彭海泉壮烈牺牲，伤亡目兵四十余人。当该营正与敌人激战时，龟山鄂军炮兵的炮弹多落在我阵地上，造成伤亡。三营派人上山交涉，该炮兵不肯认账。与此同时，我第二营后面较高地也有步弹落在我阵地上。队官李济安叫我上去察看，我从侧面爬上坡时，看见有些鄂军散开在那里，他们将头埋在地下，两手举枪蹲放。一位官长走来向我道歉说：“这是未经训练不会射击的新兵打的，请你们原谅。”他随即率其所部百余人移往左翼去了。入夜我排排长方大福负伤，正兵李友胜阵亡。有两个日本人（一个为萱野长知，另一个不知其姓名）来到我营阵地看过两次，据说是黄兴的朋友来帮助我们作战的。

这时湖南第三批援鄂军第二协协统刘玉堂率其第三标到汉阳，附有五七山炮数门（其第四标尚在后面）。十一月二十四日，黄兴以四十九标伤亡重大（阵亡九十六人，伤的人数记不清，好象没有超过四百人；当时有人传说伤亡千余人，非事实），调我们到武昌休息。我一、三两营阵地由刘协三标卢明亮部接替，二营

阵地因刘协毛树骏标尚未赶到，由鄂军一部接替。

十一月二十六日，刘玉堂率部反攻美娘山，中炮阵亡；官兵伤亡三百余人。同日下午，盛传黎元洪将令本标再赴汉阳作战。实际上黎来慰劳王隆中时，虽有此意，并未作出决定。入夜后不知怎么起了个大播箕子（以讹传讹，轰动起来），士兵们纷纷荷枪沿着江边大道向后方金口方向疾走，队伍很零乱。我刚由城内出来碰见，很诧异，问他们什么事，都不回答。复问一句，才有人头也不回地说：“到金口过江包抄敌人去！”我将信将疑地站住了。一会儿又见后队有十多个人走过来，我问他们往哪里去？一个姓罗的（忘其名）边走边说：“到岳州挡敌人去。”我看情形不对，转身去看王隆中。一进标部，只见王坐在桌子旁边哭。这就显而易见，队伍是自由行动的。我回到本队，同棚的胡子德背着他的包袱和枪，又提着我的枪正在等我。一见面他发急地说：“都走了，你老不来，走啊！”我二人急行十余里，才赶上队伍。次日到金口，大家对继续前进还有点顾虑，就在该地停留一天；后见前途无人拦阻，才迤迤向湖南续进；一路零零落落，有十余人一起的，有几十人一起的，也有碰见船就搭船的，但无抢劫事件。各营过岳州时虽收容了一下，有些人则是一直跑回长沙的。甘兴典协不知道他们是由何处渡江向湖南撤退的。听说他们沿途抢劫，队伍到岳州便被解散，甘本人回到长沙被枭首正法。

四十九标回到长沙不久，就编为第四师，协、标改称旅、团，王隆中任师长，卿衡、陈强任七、八旅旅长，朱光斗、鲁涤平、杨万贵、胡兆麟任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团团。此时部队的纪律坏了，没有升得官的老兵还有七、八百人，他们骄恣横暴，横冲直撞，时常在娼寮戏院取闹，动辄和人打架生事。谭延闿无可奈何，将四十九标老标统威望素高的黄鸾鸣请出来当军务司长，

嚣张之风才逐渐制住。

四十九标虽然扩充为师，好枪甚少，训练马虎。谭延闿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即借口负担不起巨额军费（当时湖南共有五个正规师，另外还有许多杂牌部队），于次年九月，全部遣散还乡。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记杨任常德遇难

凌汉秋

辛亥（一九一一年）九月初一长沙光复后，我在西园龙绥瑞家会见了杨任。杨字晋康，辰溪人。年未弱冠，自费东渡习体育，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辛亥春间到武汉，与焦达峰等联络，共图起事，并曾独返湘西，有所部署。先是，在武汉首义之前，两湖党人开过秘密会议，内定晋康在光复后担任湖南西路招讨使。长沙光复，焦达峰出任都督，即依原议发表晋康为西路招讨使，驻节常德，划定沅江以西常、辰各属为招讨使辖区。

晋康在龙宅和我见面时，龙绥瑞向他介绍我曾任巡防营及水师管带、帮统等职，熟悉西路情况，并与当时驻常德的西路巡防营统领陈斌生相识。晋康听了很高兴，邀我同去常德。他呈准焦都督发表我为招讨副使，并赠以东洋指挥刀一把。

九月初六（阳历十月二十七日）下午，我们由长沙小西门正码头乘“江天”、“祥龙”两小火轮出发。焦都督亲自到河边送行，说了一番勉励的话。在出发之前，晋康由都督府领到湖南官钱局票子及银元宝若干，除分给同去的人作盘缠外，其余留作开办费。我现在记得，当时随晋康同去常德的同盟会会员，有余昭常、钟杰、刘汉庭、张锡先、张绍先、余化龙、涂鉴衡、胡幻安、向忠勇、余冰如以及各方面谋事求职的人共计一百四五十人。随行人员中，余昭常，字华禄，浏阳人，据晋康对我说，也是担任招讨

副使的（我称他为“余副使”，但彼此接触并不多）；钟杰系常德人，钟泰昌绸缎店的少老板，到常德后派充军需长；刘汉庭系衡阳人，曾在常德开设长春客栈；张锡先、张绍先系两兄弟，沅陵人，经营过木材生意；向忠勇系湖南陆军小学学生，均派充招讨员；余冰如系五十标标统余钦翼之弟，常德人，派充庶务科长；余化龙是奉焦达峰之命，同船去辰州接收常胜水师的。

晋康未去常德之先，曾和焦达峰商量随带军队前往，但被立宪派所扼制，未获结果。于是决定到常德后成立新军一师，带去的一百多人，大部分是准备成师后安插的。在船上时，我对晋康说：“陈斌生是黄忠浩的把兄弟，与革命党无渊源。我们这次去常德，等于是赤手空拳，用‘招讨使’的名义，容易惹起人家不愉快，不如改称‘招抚使’。”晋康不以为然地说：“这是都督的命令，不能改动的。”

九月初七，船过龙阳（今汉寿），知县但旭丹（江苏人）头戴水晶顶子，身穿官服，在河边迎接。晋康未上坡，由我代表上岸，同但入县衙门聚谈片刻。但知县仍行清朝接官礼，我面嘱他照旧供职，维持地方秩序，但现今是平等自由世界，不要再穿清朝的官服和用清朝的礼节。

在龙阳稍事周旋后，继续开船，初八早上到常德。当地商民都悬白旗欢迎，并献酒肉，以示犒劳。我们一行上岸后，在常德府考棚内设立招讨使办公处所，委派人员，开始办公。一时常德街上、挂白带子的招讨员触目皆是。常德西路师范学堂过去为宋教仁、刘尧激等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学生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很深；这时见晋康来到，全体要求参加工作。陈斌生也亲来拜访，假装顺从革命。而晋康被这些表面现象所蒙蔽，放松了警惕性，认为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无须作什么防范了。实际上，当时陈斌生统兵五营，独霸常德、辰州一带。他是黄忠浩的旧部，结盟拜

把，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到达常德后三四天，陈斌生即提议要为黄忠浩开追悼会。晋康考虑到陈拥有重兵，如不虚与委蛇，他必然产生疑虑，后患堪虞。故同意开会追悼，指派钟杰负责布置会场，并商定九月十三在常德西路师范学堂举行。

九月十三早饭前，我正在考棚的大堂上散步，忽见武陵（今常德县）知县廖世英（号子材，四川人）由西辕门匆匆走进来。他边打招呼，边从统靴中抽出一份电报交给我。我打开一看，电报是由长沙都督府发出的，大意谓焦、陈二督于九月初十被乱军所杀，公推谭延闿为湖南都督，已接印视事，望各州县照常供职。电报已经拆封，是明码译出的。我问廖知县是何处译的，他说电报局送来时就译好了的。廖走之后，我马上把电报送给晋康看，并说两督遇害，大势不好，我们要注意防范。晋康看过电报，当即派出多人出门探听消息，叫他们赶紧回报。随后匆忙吃过早饭，准备前往参加追悼会。就在马已备好、刚要骑马出发的时候，忽听到外面人声嘈杂，陈斌生的巡防兵已经冲过来了。晋康在纷乱中由陈部士兵从考棚捉到提台衙门（陈斌生驻此）前坪杀害，并被断头、敲牙、挖心，将血尸陈列堂前，以祭黄忠浩。其余被乱兵捉到的人，则在考棚左边雨厂坪被用马刀砍死。我当时见乱兵窜来，连忙返身奔跑，由考棚后面高围墙跳出去，手足均摔伤，在附近一家艾姓居民家和裴泰厚南货号楼上躲藏了几天。等到外面风声渐平静，伤口渐好转，才化装逃到长沙，转回乡间家中休养。晋康被害的惨情，是在场目击者告诉我的。后来开追悼会时，我曾作一联挽他。联云：

断头台上断头来，取义成仁，万古英灵昭日月；

封神榜内封神去，铭碑勒石，千秋浩气壮山河。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李燮和沪宁革命之经过

余 焕 东

一九一一年春间，予由辽宁本溪湖煤矿公司辞职到北京。不久，武昌起义，予乘轮赶至上海。甫抵岸，见市面均悬白旗，宣布独立，时在阴历九月十三日。嗣至上海城内都督府，见布告上署名都督李燮和。予因李系湖南安化人，曾与予同在长沙求实书院求学，乃前往会晤，被门卫阻挡，不得见。三日后，闻李已往吴淞，予赶至吴淞，乃得相见。李遂留予在该处共策进行。

李燮和原系光复会会员，后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在长江及南洋一带奔走革命，不遗余力。一九一一年来上海，在某学校借教学为名，阴与革命志士及其学生筹划革命事业。原与宋教仁所办之民立报馆访事员陈其美（同盟会会员，亦是上海会党头目）相结合，计划在某日发动起义。不意陈其美先期率领多人攻打江南制造局，被该局卫队拿获，捆绑于局内。李燮和闻讯，即率一批革命青年攻占上海县署；随又率众围攻制造局，不得逞，乃逾墙而入，将陈其美救出。当攻占县署时，群众推举李为上海都督，成立都督府。是晚，上海会党多人，邀集群众，在某大戏院开会，有某伶人携手枪登台演说，宣称：“现在上海光复，都督一席非陈英士（陈其美号）先生担任不可，请大家举手推戴。有反对者，请尝吾弹！”说毕，将手枪往桌上一拍。群众只好一齐举手。陈其美遂取得上海都督头衔。群众拥陈至都督府，李燮和当

然只有让位。当时有议推李为副都督者，有议推李为沪军总指挥者，皆无多人赞同。于是有一部分革命青年拥李至吴淞，设立军政分府。适有黄汉湘（湖南湘乡人）者在吴淞任警察局长，与李有旧，对李极为拥戴，并助李招收黎天才所部清军约三千人（黎部系清政府由广东调来驻防者），改编为光复军，命其进攻南京。黎部是素经训练的，一路进展顺利，由镇江攻至南京郊外，占领幕阜山，与苏浙各军汇合，围攻南京城。黎部于进军时沿途受降，不断扩充达五千余人。至是，黎之部队，不复称光复军，而别树一帜矣。

当李燮和初至吴淞设立军政分府时，陈其美及其党羽甚嫉忌之。某日，予与李燮和自吴淞车站乘车往上海，忽有人从车窗外放枪击李未中，李之卫兵中弹而死。随后陈其美又派会党头目某，携带手枪至军政分府，与李谈判，勒令李取消军政分府名义，李只得服从，改为光复军司令部；但要求陈都督分拨枪械子弹，俾另练新军，进攻南京。陈允之。旋由江南制造局领来步枪二千枝及子弹若干，由李燮和交其浙江友人张鹏，招集士兵千余人（多为上海无业游民），另由江剑女士招集女子队约三四百人，临时训练成军。是时适有予之旧友陈强、邹天山等来吴淞参观，予因彼等均系军官学校毕业，熟悉军事，遂向李燮和推荐，任陈强为参谋长。邹天山及同盟会同志周米苏、张斗枢与予均任参谋。并由黄汉湘在淞沪募集饷糈，共筹进攻南京。后陈强离吴淞他去，改任邹天山为参谋长。布置妥当，即运兵起程。甫至镇江，闻两江总督铁良及其将领张勋已由南京逃往江北。盖因徐绍桢统率苏、浙、沪、淞各军，攻克南京周围各要塞，并在天保城以居高临下之势向城内总督衙门开炮，铁良及张勋知势不可敌，不得不弃城逃走。于是李燮和率领军队赶入南京城内。其本部及女子队驻在

四象桥刘忠壮祠（即往日之湘军公所），参谋部驻在鼓楼北前博览会会场，余部则由张鹏率领散居附近。

予随军队至南京后，常见有携带枪枝、口操湖南乡音、手缠白布之兵士，奔走街头，找寻生活，知是张勋遗下之队伍（当张勋逃往江北时，彼等不愿随往，遂留在南京城内），予意可予收容。经与李燮和商酌，发出布告，于湘军公所招集之；并派李炯（宝庆人）主其事。于是张勋遗留在南京之湖南兵士纷至湘军公所投到；而苏浙革命军中之湖南兵士亦有携枪前来投到者；不到一星期，已招集二千人。此种招来之兵，素经训练，并皆装备齐全，可为有力之作战部队，遂交李炯统率。是时有李燮和之兄弟李云龙、李海等闻李已入南京消息，由湖南赶来南京。李燮和欲将此部队转交其弟李云龙带领，李炯未允。某日张鹏所部有少数人在下关抢劫，参谋张赞前往劝阻，不听，反而向参谋部攻击，张赞当被击毙，参谋长邹天山臀部受伤，弥月乃愈。当事发时，张鹏不能制止。黎天才闻讯，派兵前往镇压，枪杀兵士一名，事变乃平。此时予因见李部太无纪律，不愿侧身其间，且其本部既有李云龙、李海等为之参赞，予正可乘机求去，乃迁居于宋教仁寓所。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予任实业部矿务司长，李燮和军队之事，不复问矣。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部长。李燮和向其索军饷，黄给与三十万元之军用票。因当时无现金可兑，不能发饷，甚难维持，乃将李炯所部二千人交由胡瑛率往青岛（时胡瑛受孙大总统任命为山东都督）；张鹏所部约二千人交与黎天才训练统率，女子队则予以解散。李燮和本人于事竣后退居上海。嗣黄兴任李为长江水师总司令，水师将领不甚应命，无计可施，不久，辞职赴北京。

李至北京后，湖南一般投机政客，如杨树谷、方表等人，见李带有三十万元之军用票，乃帮同向财政总长熊希龄交涉，兑得现金。此辈投机政客有了本钱，遂大肆活动。后来，李燮和与杨度、胡瑛等六人（所谓筹安六君子）发起筹安会，谋改国体，拥袁称帝，不无远因也。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供稿）

湖南时务学堂略志

唐才质

时务学堂设于长沙小东街（今中山西路）刘文恪公旧邸。湖南之有学堂，以此为最早，丁酉、戊戌（1897—1898）间，有最高学府之称。当年主湘政者：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前后学使汪标、徐仁铸等，皆具有维新思想；所聘中文教习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等亦皆有名学者。学堂筹办之始，熊希龄总其成，湘绅蒋德钧、谭嗣同、唐才常及陈抚之子三立等力赞助之。丁酉夏历十月中旬，梁、韩、叶三先生联袂抵长，新派团结日固，声势益盛，旧派虽相视侧目，然亦无如之何。于是订章程，立学约，不出旬日，学堂之规模毕具。

当时所聘教习，分中文与英文授课。中文教习三人：总教习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公，广东新会县人），分教习韩文举（字树园，广东番禺县人）、叶觉迈（字湘南，广东东莞县人），皆康有为弟子。英文教习二人：总教习李维格（字峰琴，江苏吴县人），分教习王史（字峙云，福建龙溪县人）。另聘学堂总理与监督各一人，总理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厅人），监督杨自超（字葵园，安徽石埭县人）。戊戌春，梁先生因事赴沪，添聘中文分教习欧榘甲（字云樵，广东归善县人，亦康有为弟子）、唐才常（字佛尘，湖南浏阳县人）二人（乃梁先生自沪来函约聘者）。

中文教习梁、韩、叶三先生，丁酉夏历十月到湘，遂招致头

班学生四十人，先行开课。戊戌春夏间，陆续招收二班及三班学生各数十人。凡年龄成长、文字通顺者，皆在考取之列。与外课生合计，全堂师生二百余人，聚居讲学，意气风发，是时务学堂开学后之极盛时代。

时务学堂课程以孟子、公羊为主，兼亦宣讲孔子改制之说，旨在为中国改良政治创造条件。梁先生讲学时，自言吾辈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之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之政治论。自今观之，此种教法虽甚幼稚，但在当时对于启发同学之意志，却仍有一定作用。韩、叶两先生支持此教学法，相习不变。又臆举清朝失政，鼓励诸生黾勉求学，为国致力。在当日，对于学术与政治改革问题，仍表现一定进步性。梁先生去湘后，欧、唐两先生担任第二班学生讲席，一面讲演西儒学说，一面阐明中国经世致用之学，使学生皆自期许，有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之志。唐才常先生服膺王船山之学说，日以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之言论，启迪后进；又勸勉诸生，熟读赏书、噩梦、明夷待访录、日知录等书；时共研习，发挥民主民权之说而引申其绪，以启发思想。

回想当年同堂诸生，为学求益，事迹至多，其最大者约有如下数端：时务学堂成立，师生情谊融洽无间，诸生有事求教，可往教习室个别谈话，听取训诲，或数人集体会谈，亦无拘束，其获益一也；学堂功课以写札记为常课之一，忆梁先生初至主讲，甚为振奋，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学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诸生罔报听讲，者书自习，遇有心得，可抒意见，教师亦随时批答指导，其获益二也；戊戌春，吾省士夫创设南学会讲学，假孝廉堂为会所，以每星期日为讲期，或谈学术，或论政治，或研讨国内外时事，延揽学者名流，轮流讲演，是年

夏历二月初一日为开讲期，官绅士民集者甚盛，时务学堂诸生多往听讲，在学问上与思想上取得极大转变，其获益三也。

诸生入堂，一面讲学，一面论政，意志非常兴奋。旧派与学生初无恶感，亦无异言。及遇假期，诸生多数归省，出札记示亲友，传播反对清政，以及主张学术革命之积极言论，于是旧派哗然，大肆讥议。诸生因恐旧派进攻，须随时注意防御或反击，造成一种新旧斗争之激烈情绪。迨戊戌夏历四月二十三日，诏定国是，实行新政，旧派稍稍敛迹。诸生在此后三阅月之安定期间，加倍努力，学业有辉煌之进步。八月政变，新政中断，旧派势力仍复嚣张，诸生遂缄口结舌，不论国事，或改习实业，或出国游学，冀可保全自己实力，为他日共济时艰之准备。

戊戌夏历七月，吾省考选学生赴日留学，时务学堂学生几乎全部投考。被取录者约七十人，正整装待发，忽传八月六日政变发生，取录诸生各自星散，考选留学事亦无形取消。彼时中英文教习与留校诸生纷纷他往。某日，同学数十人设宴于长沙左文襄祠为师生话别，熊、欧、唐、韩、叶诸先生各有演说，对于同学劝勉备至，师生依依不舍，有感愤泣下者。至是年十二月举行甄别一次，学生留校者益复寥寥。明年，改为求实书院，迁往落星田求贤馆旧址，另招新生开学。“时务”二字遂成为历史名词，供人回忆。

唐才常先生与谭嗣同为刎颈交。戊戌政变，谭公被戮，先生极为悲愤。庚子（1900年）夏历七月十五日，先生决意在武汉起义救国，倾复清政。部署既定，面海外接应不至，屡次改期，以至失败。此次与先生同时殉国，死事最烈者，有林锡珪、李炳寰、田邦璜、蔡钟浩四君，皆时务学堂学生也。乙卯，袁贼不顾民意，悍然称帝。蔡锷在云南首举义旗，反对帝制。蔡君亦时务学堂学

生也。湘阴范源濂己亥（1899年）留学日本，尝主持速成师范班组织事宜，并担任通译（前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公元1903年，湘抚选派士绅十人同赴日本，学习速成师范，胡元倓、俞诒庆、陈润霖、刘佐楫、俞蕃同等与焉，是为湘省遣派学生出国之第一次。此班学员毕业回湘，湘省公私立学堂乃次第兴起）；常德蔡钟沅自庚子武汉自立军起义失败，以年少得免穷治，后来出游日本，学习工科，毕业回湘，创办乙种工业、甲种工业各校，造就工业人才甚众，此在教育界卓著成绩者。范源濂、蔡钟沅二君亦皆时务学堂学生也。时务学堂自成立至解散，不过九月，名义存在亦只一年左右，而政治思想深入人心，对于后来学术革命与政治革命，实有相当推动作用。

因受戊戌政变之影响，时务学堂被迫解散，原址改为泰豫旅馆。民元之际，梁启超先生曾一度再至长沙，手书“时务学堂旧址”六字悬于该旅馆厅上。后来旅馆停业，不知此字迹落于何人之手矣。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供稿）

湖南陆军小学

戴凤翔 杨传清 陈鹏南

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于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九月连续颁布了两道上谕，宣布“整顿兵制，停止武科”，并于各省会设立武备学堂，以“培养将才，练成劲旅”。湖南武备学堂于同年冬开始筹备，一九〇三年五月正式开学。同年又附设兵目学堂，以培养新军骨干。

一九〇五年夏，武备学堂第一期学生结业，宣告停办，即在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侧武备学堂原址（五栋两层楼房）设立湖南陆军小学堂，仍委前武备学堂总办俞明颐为总办（俞字寿丞，浙江青田人，留日学生，湖南试用道，当时以兵备道兼督练公所总办）。总办综理全堂事务，相当于后来的校长，照例由候补道充任。俞明颐于一九〇八年去职，继任者为汤鲁璠（善化人，号稚庵）。一九一〇年汤去职后，由张鸿年（广西人）继任。总办之下，设监督、提调各一员。监督相当于教育长的性质，提调相当于总务主任。先后任监督者有陈其采、谢西园、李云龙三人；任提调者有束日路、王东卢、夏国楨三人。实际上负责的是监督，总办仅挂名义，坐观其成，很少过问学堂事务。据刘兴回忆：第一期学生在校三年半，仅于开学典礼及中途闹风潮时见过俞明颐两次，平日不见其踪迹。除了监督、提调以外，陆小每期设学长三人（但第一期则设有六人，如杨传清、曾君典、易谷、范介标、项致庄、

李某等，均系兵目学堂毕业生），专任管理；各科教员若干人，其中兵学教员是专职的，普通学科教员则多由省会各文学堂教员兼任，第一期教生理卫生科的系日本人佐久间（长沙同仁医院院长）。

开办陆军小学的目的，是为了长期造就军事人才。其时仿日本军制，在各省会设立陆军小学（相当于日本的地方幼年学校），招收年在十五岁至十八岁的青年学生，授以基本的军事学术科和普通学科，修业三年期满后，升入陆军中学（相当于日本的中央幼年学校）。当时全国设有陆军中学四所（北京近郊清河镇、南京马标、武昌南湖、陕西西安），湖南陆小毕业生，多升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陆军中学毕业后，再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相当于日本士官学校）。也有直接升入日本士官学校的，如程潜自武备学堂毕业后，保送日本士官学校六期毕业，贺耀组在陆小一期毕业后，升入陆军中学一期，中途送往日本士官十一期。

湖南陆军小学于一九〇五年八月成立，招收第一期学生。当时一切规章，完全依照清廷陆军部的规定。但因创办较早，事无前例，有些地方结合本省具体情况，稍有变更。如部章规定学生来源，应由各县高小毕业生考送，当时长沙府属十二县，虽设有高小，而无毕业生可挑，于是改为由省自行招收。从第二期起，则系由全省六十三州县考送，报考者极为踊跃。据陈鹏南回忆：一九〇九年夏第四期招生时，武冈县报考者五百余人，高小学生占十之八九，经过体格检查及学科考试，取录十名送省复试；到省后，又经过体格检查及两场学科考试，仅取录陈鹏南一名。当时学科考试内容，主要是试国文，题目多出自《论语》、《孟子》，如第四期省会复试，头场试题为《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论》，二场试题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论》。

湖南陆小学生名额，原规定：正额生九十名，由各州县考送；

附课生三十名，凡外省宦游子弟、本省官吏子弟及新军优秀士兵（如贺耀组系由二十五混成协保送）均可保送，自备学费附课，每期缴纳学杂膳费银三十两。但是实际上新军优秀士兵入学的并不多，而达官显要的子弟则得到夤缘入学的机会，因此，实际入学的名额往往超过规定人数。据刘兴回忆：第一期学生达二百余人。入校后，严加剔选，每月经过月考甄别，分为优、上、中、下、劣五等。按部章规定：陆小学生待遇，每月每人平均四两五钱纹银。学堂为鼓励学生计，除伙食费一律开支三两外，优等月给津贴二两四钱，上等二两，中等一两六钱，下等不给津贴，劣等立即开缺。这样，逐月淘汰，最后参加陆军中学升学考试的仅有七十二人。又如第三期学生中，邵阳县即有刘重威、谢焘、魏彪、魏均、魏云等五人，其中魏姓三人，是当时两江总督魏光焘的子侄（魏彪是近视眼，本来不宜于习陆军的，结果也取录了）。

学生年龄，部章虽规定十五岁至十八岁，实际上超龄学生很多，个别的将近三十岁。

陆小的课程，分学科、术科两部门。术科以班、排教练为主，劈刺、器械操为辅，主要在野外演习。武器以日本村田步枪居多，也有汉阳七九步枪及其他杂牌枪枝。学科方面，分军事学科与普通学科两种。普通学科有国文、外文（英、法、德、日文均有，由学生选习其一，中以选习日文者多，选习德文者少）、修身、历史、地理、理化、博物、生理卫生、三角、几何、代数等；军事学科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野外勤务、测绘学等。学堂对学生管束极严，月终考试成绩列劣等的开缺，操行不及格的也一律开缺。正额学生出缺时，有时即以优秀附课生递补。

湖南陆军小学前后共办五期。第一期于一九〇五年秋季入学，照部章应在一九〇八年秋季毕业，因陆军中学校舍建筑未竣工，

延至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春毕业，是年秋升入中学；第二期一九〇七年入学，一九一〇年毕业；第三期一九〇八年入学，一九一一年毕业。辛亥长沙光复前夕，第四、五两期在校学生二百余人。每期毕业学生，一般升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小学毕业后，如考陆军中学落第时，可转入军需、军医、兽医三校学习。湖南陆军小学历届毕业生中：唐生智、贺耀组、刘兴系陆小第一期学生；戴岳（原名戴哲人）、陈浴新系第二期学生；陶峙岳、曹伯闻（原名曹政典）、罗霖（原名罗毅）、周斓系第三期学生；胡达、罗藩瀛系第四期学生；毛炳文系第五期学生。刘峙也是湖南陆小第三期学生，当时名叫“黄谊本”（随母下堂改姓），后来经陆中而升入保定第二期。

辛亥八月十九（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湖南以后，新军二十五混成协的进步官兵和陆军小学的进步师生，大都跃跃欲试。新军与陆小方面，平日素通声气，在起义前夕，彼此之间是有些联系的。如学长李鸿钧，学生向忠勇、陈图南、包凯、李昌杰、王大桢等，与焦达峰、陈作新都是暗中有联络的，因为李鸿钧、向忠勇等多是湘西人，与会党有渊源。陈作新在离开四十九标以后，住在李藩国家（即李培心堂），还经常秘密到陆小访问联系。当时陆小的主持人非常顽固，对学生的思想采取禁锢办法，不许阅读有关宣传排满革命的报刊书籍。但是一些进步学生还是想尽了方法从外间找到这类书刊，秘密阅读，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影响。曾记一九〇六年六月，禹之谟、宁调元等发动长沙各学校男女青年学生，不顾官方当局的阻碍，开追悼会公葬陈天华、姚洪业两烈士于岳麓山，陆小第一期学生大部分参加了这次群众性的政治行动。长沙起义前夕——八月三十日晚间，陆小学生中与革命党人早有联系的积极分子，暗中通知各同学，睡

觉时莫脱鞋子，把枪支靠在枕头边，以便应付紧急事变。大多数同学都照此作了准备，但也有一小部分胆怯的人，连夜请假外宿。九月初一是星期日，陆小学生例假休息，大部分人进入市区；后来看到新军起义，分路进城，于是陆续回校集合，各自荷枪进城，与新军配合巡查市区。翌日下午，市面陡起谣风，说黄忠浩的旧部黄东旭将举兵攻城，为黄报仇。陆小学生闻讯，就在学堂附近校场坪紧急集合，全体荷枪实弹，整队进城。大家跑到小吴门外一带，就地散开，准备抗击叛兵。这时，小吴门的守城新军，要我们率队进城，以免妨碍射击目标，乃进城暂驻曾文正祠（今长沙市第十四中学）待命。后经侦察，始知攻城之说全属谣言，遂于初三上午返回学堂。陆小学生中过去与革命党人早有联络或者思想比较激进的，则在光复时参加了实际革命工作，担任新军中的下级军官或其他职务。如向忠勇随西路招讨使杨任赴常德，担任招讨员，九月十三在常德与杨同时遇害。

长沙光复前，陆小监督李云龙调职广西，早已离湘，校务由提调夏国桢（湖北人）负责。起义几天之后，有人向督署告发，说夏是反对革命的，因此被逮捕，拘押于督署，并由督署将陆军小学堂改为陆军小学校，委派刘鸿逵为校长。随后，又改委戴凤翔接充，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到校视事。

四月上旬，南京留守黄兴通令南方各省，陆军小学一律停办，所有学生全部送南京进入伍生队受训。其时陆小在校学生有一百六七十人，系第四、五两期生。湖南督署将停办陆小的命令转发到校后，校长戴凤翔即赶办结束事宜，随即率领学生一百六七十人，乘“快利”轮船由长沙出发。到南京下关时，适赣军俞应麓部在城内哗变，不能进城，宿于下关海宁寺。第三天始率队进城，住南京碑亭巷南洋第一楼。次日，戴凤翔往留守府见黄兴，黄面

嘱戴与入伍生队队长沈靖（浙江人）接洽编入该队事宜。当时学生在途中生闹疮的很多，在入伍生队检查身体的时候，凡生闹疮比较厉害的，都被军医剔除，不予取录。后经留守府军务厅长张孝准决定，将未取录的二三十个学生，全部编入复城桥军需学校第一期受训。编入入伍生队的学生，后来则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开办七年的湖南陆军小学，至此全部结束。

编者注：本文字成后，曾经曹伯闻、刘兴两先生校阅，并在个别地方作了补充订正。

从清末到北伐军入湘前的湖南报界

张 平 子

我在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参加《湖南公报》工作，一九一四年，随同贝允昕等脱离该报，于一九一五年另行创办《大公报》。此后，即长期在该报工作，直到一九四七年才脱离报界，先后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六年。对于湖南报界情况，略知大概。兹就个人经历和记忆所及，并参考有关湖南报界的历史记述，如李抱一的《长沙报界史略》、黄性一的《过去湖南的新闻事业》、《大公报廿周年纪念册》以及《大公报》的存报等资料，叙述湖南报界情况，从清末创办《湘报》开始，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入湘时为止。

本篇以分期叙述大报（包括《湖南通俗日报》）为主，对于小报、通讯社和“湖南报界联合会”也分段地作了简略的叙述。

本篇依据湖南政局的嬗变，分期概述湖南报界的情况：一、辛亥光复前夕：湖南自办的报纸很少，主要是传播外地的报纸；二、辛亥光复后到汤芑铭入湘前：人心振奋，舆论活跃，湖南报纸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三、汤芑铭统治湖南时期，由于汤仰承袁世凯的鼻息，专横残暴，钳制舆论，摧残报纸，湖南报界一度凋零；四、谭延闿再次长湘时期：在湘人治湘的标榜下，主政者拉拢报界，报界更乐于趋附，互相利用，报纸又呈复苏之状；五、傅良佐、张敬尧相继统治湖南时期，以北洋军阀的一贯专横粗暴，对于报界的摧残，张不亚于汤，湖南报界再度凋零；

六、谭延闿第三次长湘（为时甚暂）和赵恒惕统治时期，主政者相继标榜“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不得不极力制造和收买舆论，因而报界又趋活跃。总括说，从辛亥光复到北伐军入湘时，湖南报界伴随着政治的嬗变，呈现着三起两伏之势。

（一）

辛亥光复前，在湖南流行的报纸有《民报》和上海《时报》、《申报》、《新闻报》四种。《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系章太炎等所主编，内容多为鼓吹革命，在日本印行，秘密输入湖南，极为教育界和社会进步人士所欢迎。上海《时报》主张改革政治，振兴实业，在当时仍不失为比较进步的报纸，也受到教育界和社会上层人士的一定喜爱。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偏于商界消息，当日在国内销路最广，在湖南也是流行较多的。

辛亥光复前，在湖南散播革命思想和推动革命潮流的报刊主要是上述的外地报纸和其他一些小册子，如《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黄帝魂》、《血泪书》等等。当时，湖南自办的报纸仅有《湘报》、《湖南官报》和《长沙日报》。《湘报》出刊最早，为时甚暂。《湘报》停刊以后，才有《湖南官报》。《长沙日报》则是《湖南官报》的改名。前者起了开拓风气的一定作用，后者则是官方喉舌，根本反对革命的。

光绪丁酉、戊戌年间（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陈宝箴为湖南巡抚，黄遵宪署按察使，江标、徐仁铸先后任学政。他们都以讲求实学、开通风气自命。同时，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在湖南积极开展变法维新运动，湖南风气逐渐开拓，遂有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创设，报纸也应时出现。

《湘报》，创办于戊戌二月（一八九八年三月）为湖南报纸的

创始。馆址设在小东街（今中山西路）刘文恪公旧宅。黄遵宪、熊希龄为主办，唐才常为总撰述，谭嗣同也时有论著，时务学堂的学生，如蔡良寅（蔡锷）、黄颂銮、辜天佑、张伯良、许崇勛、曹典球、杨昌济、谢功肃等也都时有论著在该报发表。该报用毛边纸和四号字印行，每日出一张，装订成册。内容包括论说、奏疏、电报、公牋、本省新政、各国时事、杂事、商务等栏；宣传变法维新，“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大为顽固守旧分子所攻击，被指为“竞务夸诞，风俗人心隐受其害”。八月政变，被迫停刊。该报存在时间虽仅半年，但声誉极好，起了开拓风气的作用。

《湖南官报》，是在《湘报》停刊以后，湖南士绅请准于壬寅三月（一九〇二年四月）开办的，由湖南洋务局监督办理，成为官绅合办的报纸。形式大体与《湘报》相同，而实质迥异。内容包括谕旨、奏疏、中国近事、外洋近事、征集文稿等栏；虽然标榜以“通达时务，研究实学”为宗旨，但又有所谓“一切叛逆怪诞之词，犯上狂诞之语，均所摒绝”，显然是官方喉舌，为封建大地主、大官僚服务的；仅能向各机关和官吏中派销，社会上无人过问。主持人是萧仲祁、曾庆榜（萧、曾都是前清的举人），余如主笔、编辑的姓名，现已记忆不清了。由于派销的报费积欠太多，无力继续维持，遂于乙巳二月三十日（一九〇五年四月四日）停刊。

《长沙日报》，是在《湖南官报》停刊后，湖南巡抚端方令饬将《湖南官报》收归官办并改名的，于乙巳三月十五日（一九〇五年四月十九日）刊行（同时，仍用《湖南官报》的名称，另出旬刊，于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刊行）。馆址初设在文运街五贤祠内，旋移至理问街一条巷，辛亥年又移至南门外上六铺街铜元局。初委王佐臣为总办，萧元瑞、沈习之、王铭心、沈菊清、徐绍仪等分任主笔、编辑。端方去湘后，王佐臣他调，沈、萧以次接办，由善后

局每月拨款接济。该报由上海购进铅字全付及手摇印刷机一部，并由湖北招来印刷工人（其时，湖南尚无铅字印刷工人），每日出版一大张，完全仿照上海《申报》的样式；内容除上谕、宫门抄、奏牍、公文外，还有本省新闻和省外新闻；所有稿件须先经抚院文案处审核；售价很廉，每月每份只收二百四十文到三百文。该报在官厅直接主持下，经过改头换面，在形式上较之《湖南官报》虽有所改进，实质上仍极为落后和反动，比之《湘报》则不可以同日语。由于纯系官方报纸，社会人士不愿订阅，只能由抚院札飭各机关和各县派销；当时，抚院还颁订了承销奖励办法；但发行数额仍不到一千份。

（二）

辛亥光复后，人心振奋，民气风发，湖南报界也大为活跃。除原有的《长沙日报》而外，新兴的报纸多至七家。

辛亥光复前，湖南已有同盟会和宪政派的分野；到了辛亥光复以后，这种分野就更加明朗，斗争也更趋尖锐。其时，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报界占了绝对优势，报馆的数量和报纸的质量，都居于支配社会舆论的地位。如《长沙日报》、《国民日报》、《军事报》、《军国日报》都是国民党的喉舌；其他如《黄汉湘报》、《大汉民报》、《湘汉新闻》、《天声报》、《天民报》、《女权日报》等，或者主办人是国民党人，或者倾向国民党，也都算是国民党方面的报纸。宪政派在辛亥光复以后，有所分化，其大部分成员成为后来的共和党和进步党的基础。他们在旧社会的上层虽然还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但是表现在报纸方面，则显然暗淡无光，远远赶不上国民党。当时，仅有《湖南公报》在后一时期，算是进步党的党报，而且质量和声誉都已大大降低了。

当袁世凯酝酿称帝时期，拥护共和与鼓吹帝制，反袁与拥袁，成为湖南报界分野的中心问题。属于国民党方面的报纸，集中力量，反对帝制，拥护共和，博得社会上广泛的赞同，形成一股反袁的洪流；仅有进步党的《湖南公报》对于帝制采取模棱态度，也还不敢公然鼓吹。正由于国民党方面的报纸，在当时占了绝对优势，就为后来汤芑铭大肆摧残报界伏下了根源。

当时，各报都注重政论，几家较大的报馆各有专写社论的三、四人；有时，同一天登载社论多至二、三篇。如《长沙日报》的孔攘夷（孔昭绶的笔名）、黄树园（黄钧的笔名）、《国民日报》的陆爱群、李仲庄（李隆建字），《湖南公报》（光复初时，该报还不是进步党的党报，持论还公正）的张劲公、曾星筌、陈天倪（大学教授，现任湖南文史馆馆员）等都是日以社论相商榷，相抨击，颇为时人所称许。其次是偏重小说，类皆长篇。例如李抱一在《湖南公报》、胡澍城在《国民日报》所著的小说和谭艺甫在《长沙日报》所译的外国小说，都见称于当时。此种风尚，直到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以后，才逐步改变。此外，还注意翻译，除翻译小说外，新闻方面也经常译自外电或外国报纸。因此，几家较大的报馆都各有专任翻译的一、二人，例如《长沙日报》的谭艺甫，《湖南公报》的姜蒲生，后来的《大公报》的赵闲云、李青崖等都以译述见称于一时。

兹将这一时期的各报概况分述如下：

《长沙日报》，原是辛亥光复前的官办报纸；光复以后，彻底改组，成为同盟会（后来的国民党）的党报，面貌一新，销路激增。馆址由南门外铜元局迁到青石井，后又迁至府后街。最初，由政府委派颜昌晓（号息庵，湘乡人，擅长文学）接收，颜引用他的高足任凯南（懋忱）、黎锦熙、朱让枏、李晋康等分任主笔和

编辑。旋因颜不是同盟会员，有时拒绝发表同盟会的文稿，遂被撤换，改委文斐（号牧希，醴陵人，同盟会会员）主持，以傅熊湘（号君剑，醴陵人）为总编辑，孔昭绶、黄钧（号梦蘧，醴陵人）、刘谦（号约真，醴陵人）、郑泽（号叔容，长沙人）、龚芥弥（湘乡人）、马惕冰、谭艺甫等为编辑，阵容为之一新，撰述内容也较丰富，颇负时誉。

《黄汉湘报》，是辛亥光复后最早创办的报纸之一。九月初一光复，该报即于十月创刊。系陆孟慈（留日学生，以办报作升官门径）、彭振元所创办，陆任事务经理，彭任编辑经理，彭铁铮、李肖聃、陶孝宗（即陶菊隐）等任编辑撰述。社址设在湘社仓。由于该报偏重营业性质，内容平凡，缺乏号召力量，且以经费困难，发行年余后即停刊。

《大汉民报》，也是辛亥光复后最早创办的报纸之一。系杨华生等所创办。内部人事只记得刘慈（现任湖南文史馆馆员）曾任该报编辑，其余的人都已记忆不清了。馆址设在顺星桥枣园。该报系用有光纸单面印刷的，形式极为简陋，但当光复之际，《长沙日报》中断，其他报纸还未出现，加以战事频繁，交通阻塞，人们需求报纸，如饥似渴，该报又是胡石安（同盟会员）在武汉主办的《大汉报》（该报鼓吹革命甚力，极负时誉）的分支，独能将有关湖北首义后的消息和湖南政府方面的重要文电及时报道，因而尚能风行一时；迨后，其他报纸相继出刊，便相形见绌了。一九一二年三月，该报以发布“号外”攻击湖南第四师师长王隆中，被政府罚令停刊七日，适因经费困难，遂自行解散。

《湘汉新闻》（《天声报》、《天民报》），是继《大汉民报》而起的报纸。初名《湘汉新闻》，社址设在尚德街；系孙冀预（投机商人）、徐石禅、黄澜父（徐、黄都是绅士，颇有文名，与谭延闿、

叶德辉之流关系颇密)等所创办,孙任总经理,黄任总编辑。旋改名为《天声报》。后来又因成本璞(留日学生,国民党的激进分子)加入,再改名为《天民报》;孙仍任总经理,成任总编辑,王柏安、周葆真、黄性一(周、黄二人现任湖南文史馆馆员)等分任编辑撰述。同时,该报发行了画报若干期,由文海安主编,为湖南画报的创始。该报以反对帝制,于一九一三年年底,被汤芗铭查封。

《女权日报》,是辛亥光复后不久,由丁云龙、丁步兰(都是留日学生,云龙是学纺织的,)夫妇发起,唐群英(衡山人,女学校长)、张汉英、周天璞(曾任湖南文史馆馆员,已故)等参与创办的,为湖南妇女界举办报纸的先声。社址设在南门上墙湾,每日出版两大张,适应当时妇女参政运动的澎湃开展,以鼓吹妇女参政为主旨,内容颇为完备。由于纯系私人支撑,经费困难,出刊数月后即停。

《军事报》、《军国日报》,是唐麟(号桂良,浏阳人,日本士官学生,同盟会会员)于一九一一年所创办的。初名《军事报》,一九一二年七月改名为《军国日报》。社址设在犁头街。唐自任社长,危道丰为副社长,萧汝霖为总编辑,张秋尘、谢同甫、方僧根等为编辑、撰述。内容偏重军事消息。由于该报是同盟会的报纸,后来遂与《湖南民报》合并为国民党的党报——《国民日报》。

《湖南民报》是一九一二年七月创办的,社址设在黄泥墩。唐支厦(国民党湖南支部的骨干分子)任社长,彭名时、黄康圃等任编辑。一九一三年,国民党湖南支部成立,以该报与《军国日报》都是同盟会的机关报,遂合并为《国民日报》。

《国民日报》,是一九一三年由《湖南民报》和《军国日报》合并组成的,与《长沙日报》同是国民党的公开的党报。社址设在犁头

街《军国日报》旧址。罗介夫为总经理，胡谔城为总编辑，陆爱群（广西人，在湘办报甚久）、李隆建、易象、周鳌山、黄菊人等分任编辑、撰述。一九一三年年底，被汤芑铭查封。

《湖南公报》是一九一二年四月创办的。社址初设在东长街（今蔡锷中路），后迁至洪家井。初由李葆霖（安化人，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袁子素（卑鄙的官僚，曾拿家谱向袁世凯请求联宗）任总编辑，贝允昕、黎锦熙、李抱一、任凯南、曾星笠、陈天倪等分任编辑、撰述。该报成立伊始，持论尚称平正，虽然接受了共和党的津贴，还未成为共和党的党报，惟已与国民党异趣。其时，周震鳞以国民党湖南的领导人之一、充任湖南筹餉局总办，曾向地主、富商募捐，为地主、富商所不满。该报即借此著论攻击，因而触怒了国民党人，遂有国民党员数十人捣毁该报器物的事件发生。其时，在湖南，国民党的声势无论在社会、在报界，都是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出此粗暴举动，颇为时人所不直，反而给予《湖南公报》方面以反噬的口实。

《演说报》，是由自由演说者彭章、张五皮（湘阴人，自称脸皮甚厚，不怕丑；嘴唇皮甚薄，会说话；鼻梁皮甚硬，能挑重担；肚皮甚紧，能挨饥饿；脚皮甚厚，会走长路；故自号五皮）、执卑和尚（湘潭人，常在街头演说）等于一九一二年四、五月间所创办的（另一说，湖南都督府演说科曾将各名人的演说词用单张印行，长短大小不一，积累到数月以后，又改印单行本，命名为《民国新论》、《中华光复记》等，此即《演说报》的来源）。馆址设在南门外上六铺街铜元局。由何雨农代向政府交涉，每月由政府津贴二百元。每日出四开小报一张，用洋杭连纸单面印。内容除演说词外，有国内外和本省地方新闻以及歌谣、故事等等，全部用语体文，虽电报、公牍也都译成语体，为湖南小报的创始，也是语体文报

纸的创始。后来，学务司演说总科改组为“模范演说团”，同时将《演说报》收为公办，又购置理问街李宅为团址兼馆址。以何雨农为演说团长，兼办《演说报》。此后，该报遂隶属于教育行政机关。

(三)

汤芑铭是一九一三年十月入湘，一九一六年七月被驱离湘的，统治湖南有两年半之久。在汤芑铭入湘以前，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刺以后，湖南反袁斗争已甚尖锐。先是，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九月下旬，已在湖南成立了国民党湖南支部。至是，湖南报界，除了《湖南公报》而外，几乎全是国民党的党报，或者倾向国民党的。它们一致反袁，其中尤以《长沙日报》和《国民日报》反袁更力。汤入湘以后，大肆屠杀国民党人，对于国民党方面的报纸，一概封闭，无一幸免。另一方面，汤为了粉饰门面，鼓吹帝制，自己创办了《国民新报》，作为政府的喉舌。此外，还有《大同日报》和《湘报》，虽是在汤统治期间创刊的，但都无声无色，为时甚暂，前者以反袁被封，后者是自行停刊。在这一时期，异军突起的是《大公报》。该报虽然反袁，但经过复杂的斗争，幸免停闭。综计在汤统治湖南期间，湖南报纸只剩下拥袁捧汤的《国民新报》，对于帝制采取模棱态度和依附于汤的《湖南公报》，几经波折而幸存的《通俗教育报》，摇摇欲坠的《大公报》和在汤离湘前夕始创办的《湘省日报》。

兹将这一时期的各报概况分述如下：

《长沙日报》和《国民日报》，在汤入湘以前，既反袁甚力，自汤入湘以后，两报自揣危险，自行改组，冀能幸存。《长沙日报》，文斐和傅熊湘去职，改任廖汉瀛（醴陵人，高等专科毕业）为总经理，龚芥弥为总编辑；《国民日报》，罗介夫和胡谭城去职，改由

方重肩、方古愚分任经理和编辑。但两报仍为汤所封闭，并指名通缉文、傅、罗、胡诸人。

《湖南公报》，原接受共和党的津贴；汤入湘后，共和党并入进步党，该报遂成为进步党的党报；汤并强迫该报工作人员一律入党。除袁子素为所诱致外，余如贝允昕等都相率离职。改由刘腴深（浏阳人，长汉学）继任总经理，黎锦熙继任总编辑。不久，刘、黎又去职，该报遂更趋没落。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当时该报还未成为进步党的党报），该报以指责杀害杨德邻等，被罚停刊半月；一九一四年七月，又以登载郴州兵变原委，被指为泄露军事秘密，复被罚停刊二月。该报成为进步党党报以后，对于袁世凯的帝制活动，采取模棱态度，既未表示反对，也未公然鼓吹；由于进步党的主干汤化龙（汤芎铭的胞兄）的护持，因而得与汤在湘共其始终。该报既附袁拥汤，本为湘人所不齿；但当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廿一条灭国条件时，该报曾著论反对，并鼓吹排斥日货，曾因此引起了外交纠纷（日本政府要求封闭该馆和向日道歉，未遂）。对此，湘人还有一定的好感。汤离湘后，该报随之停刊。

《通俗教育报》，是一九一四年由《演说报》改名的。最初仍由何雨农主办。对于报纸的形式（改用新蓬莱纸印行）和内容，都有所刷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袁世凯的言论时常隐约地出现在“评论”和“演说词”中。因言论涉及教会，为教会中人所仇视，以该报有反袁的言论向汤控告。何雨农因此被捕，并被判处徒刑六个月。改委郭勉斋为社长，刘宗向（号寅先，曾任文史馆员，已故）为总编辑。在他们主持期间，大体上还继续了前任的精神。旋因刊登涉及帝国主义罪行的新闻（登载了美国人虐待菲律宾人的故事，并有插图，引起了在湘的美国教士向该报质问。郭答以系从《东方杂志》转译为白话的。教士幸幸而去，竟至层报美国领

事、公使以至美国政府，成为两国政府的交涉案件，交涉的结果是仍由当地“调解”了事），郭被免职。先后委任陈崇祖、徐炳龙（陈、徐均湖北人）主持。至是，该报完全变为汤的喉舌，极力鼓吹帝制和拥护袁世凯称帝。

《国民新报》，是汤入湘后所创办的政府报。社址设在尚德街。初以李华堂（湖南人，会党头目）为经理。一九一四年七月，改名为《大中报》，并改委将军署洋文秘书王济周（湖北人）为经理。内容非常腐败，尤以极力鼓吹帝制，为湘人所不齿。除向机关派销外，无人订阅。汤离职时，该报停刊。

《大公报》，是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办的。社址设在犁头街。先是，贝允昕、任凯南、龙兼公、张平子等脱离《湖南公报》后，即另行筹办《大公报》。该报创立时，先后由刘人熙、贝允昕任社长，朱让枬（湘潭人）、李晋康（长沙人）任经理，李抱一（新化人）、张秋尘任总编辑，龙兼公、张平子、赵闲云（均湘潭人）、魏先朴、潘纯村（均长沙人）等任编辑撰述。该报成立伊始，即著论抨击帝制，为全省人士所欢迎，销售数量增至万份。汤虽仇视该报，但以社长刘人熙为湘绅领袖之一，物望颇隆，只好容忍；既未便率尔封闭，便施展收买手腕，曾约请总编辑张秋尘至将军署文案处，给以三千元的支票，并威胁张，说：“知道你们报馆经费不足，特与此款以资支持；以后如再反对帝制，即行严办！”等语。张持款回馆，与同人商量结果，为了保存报馆，此后反对帝制的言论，表面上稍微缓和；但字里行间的讥消讽刺，比以前更加泼辣，汤也未再过问。

《大同日报》是一九一三年唐济美（国民党员，留日学生）等所创办的；因反袁，出刊数月后，即为汤所封闭。

《湘报》，是一九一四年龚元斌（留日学生，国民党员）、郭开第

(留日学生，律师，倾向国民党)等所创办的。龚任经理，郭任主笔。馆址设在青石井。由于该报内容贫乏，销路很差，且因经费困难，数月后即停刊。

《湘省日报》，是一九一六年汤离湘前夕创办的。社址设在登隆街。由萧石朋任总经理兼总编辑，萧石勋、萧石君(留法学生，现尚在法国)、黄性一、王恒、李思汉、韩景苏等分任编辑、撰述。当袁世凯取消帝制以后，湖南国民党人流亡在外的逐渐回湘，覃振即于此时在长沙暗设国民党支部，旋又组织正直社，委托萧石朋以正直社名义创办《湘省日报》，实质上是国民党的党报，著论鼓吹湖南独立。虽为汤所不满，顾大势已去，汤亦无可如何。

(四)

一九一六年七月，汤芗铭被逐离湘，刘人熙一度出任湖南都督，为时甚暂。八月，谭延闿再度督湘，到一九一七年九月，傅良佐、张敬尧相继窃据湖南为止，为时仅一年多。由于谭素以圆滑见称，善于敷衍和利用报界，因之，湖南报界再度趋于活跃。除汤的《大中报》和进步党的《湖南公报》已于汤离湘时停闭外，原来保存的报纸有《大公报》、《湘省日报》和《通俗教育报》；复刊的报纸有《长沙日报》和《国民日报》；创刊的报纸有《民国日报》、《湖南新报》、《湖南民报》和《民耻日报》等，一时增至九家之多。

在此时期，湖南政治上的主要矛盾是湖南地方实力派与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其次是湘、桂之间的矛盾；湖南内部也开始酝酿着谭、程(潜)之间的矛盾。反映到报纸方面的情况是：作为北洋军阀喉舌的报纸已随汤去湘而停闭了；桂系在战事方殷，来去匆忙的情况之下，不及在湘创办报纸；程派在湘原来没有基础，仅凭军队进入长沙，且为时甚暂，还不足与谭抗衡。因此，当时

的湖南各报，几乎都是拥谭或者倾向谭的（后者如《大公报》）。它们反对北洋军阀是一致的，为后来张敬尧猖狂摧残报纸伏下了根源。对于桂系，则采取依违应付态度，时或杂以讥讽。谭、程矛盾还未表面化，很少反映到报纸上来。这一时期的报纸，关于战讯的报道，始终占了主要地位；其他兴革，本来就很少，亦少涉及。

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以后，湖南报纸的形式和内容，基本上是陈陈相因，很少改变，各报之间，也只是大同小异。一般的内容和排法大抵是：首列“社论”、“专电”（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主，用二号字排印；其次是“外电”（以路透社、合众社、德华社为主），用三号字排印；再次是“中央新闻”（采用快讯稿或剪报）、“各省新闻”（采用通讯稿或剪报）、“本省新闻”（采用通讯社稿和自行采访）、“各县地方新闻”（主要是通讯稿），最后是“小新闻”，内容包括中央、本省和本埠的所谓“富有趣味”的琐闻，其实绝大部分是黄色新闻。

兹将这一时期的各报概况分述如下：

《大公报》，仍由贝允昕任社长，张秋尘任总编辑。贝以正直见称，颇负时望，对谭素不满其为人。该报对于湖南内部派系纷争，一贯采取较为超然的态度。因此，对于谭系，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湘省日报》，继续出刊到一九一七年九月，傅良佐入湘时始停刊。

《通俗教育报》，汤芑铭所委派的主持人已随汤去职，仍委何雨农为馆长，后又改委颜昌晓继任馆长，恢复了旧日的精神。

《长沙日报》，于一九一六年秋季复刊。仍以文斐为总经理，傅熊湘为总编辑。一九一七年七月，毁于火。

《国民日报》，于一九一六年秋季复刊，改以唐支厦为总经理，胡谔城仍为总编辑。以上两报的编辑、撰述多是一九一三年被封以前的旧人。

《民国日报》，是一九一六年秋季创办的。社址设在仓后街。主持人为包道平（湘乡人，省议员）、鲁荡平、谭雪庐等，完全是谭系报纸。

《湖南新报》，是一九一六年夏季创办的。社址设在尚德街。以宁坤为总经理，杨承曾、杨绩熙（湘乡人，省议员）先后为总编辑。次年改组，由黄镬（湘潭人，留日学生）等接办；也是谭系报纸。

《湖南民报》，是一九一六年七月创办的。社址设在戩子桥。出刊后不久即停。它的人事安排，现已记忆不起。

《民耻日报》，是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间创办的，出刊不久即停。

（五）

一九一七年九月，傅良佐入湘，随即有刘（建藩）、林（修梅）宣布永、衡独立；十一月，傅出走，湘、桂军进驻长沙，为时仅数月。一九一八年三月，张敬尧进驻长沙，充任湖南省长兼督军，直到一九二〇年六月，始被驱走。张敬尧统治湖南达两年多。在此时期内，湖南处于南北军阀混战中。张敬尧摧残湖南报界，较之汤芑铭，过无不及。在张统治期间，长沙的报馆尚有七家，似较汤统治期间为多。其实，在此七家中，鄂人所办，偏属营业性质而基本是依附张的占了四家；湘人自办的报纸只有三家，即原有的《大公报》、《通俗教育报》和新办的《湖南日报》。《大公报》和《湖南日报》是以工商界为护符，得以幸存，但仍屡遭封闭；《通俗

教育报》由于是官办的，只须撤换人事，不涉及存废。其他几家湘人新创的报纸，都是随创随封，为时甚暂。由于湘军驻守郴、永，有几家原来设在长沙的报馆，此时随军迁至郴、永；也还有在郴、永新创的报纸；这些报纸后来都随湘军迁来长沙。综计在张敬尧统治时期，先后被封闭的报馆有《正义报》、《公言报》、《正声日报》、《华瀛觉报》等；至于《国民日报》、《民国日报》、《湖南新报》、《湘省日报》等，则在傅良佐入湘前夕，即已被迫停刊。被张杀害的新闻工作人员有《华瀛觉报》的经理谭笃恭。其他如报馆被检查，报馆工作人员被拘禁、被驱逐，更是常事。湖南报界再度凋零。

兹将这一时期的各报概况分述如下：

《大公报》，为傅、张统治湖南时期，与《通俗教育报》仅存的原有两家报纸。傅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入湘，该报于十一月因登载北洋军阀直、皖两系的分裂和斗争的消息，即被封闭，到一九一八年五月始复刊。同年七月，又因登载常德独立消息（时冯玉祥驻常德，与驻郴、永的湘军有默契），再被停刊二十余天。复刊之日，该报披露了停刊原因，又触张怒，当日再被封闭，久之始再复刊。是年，张敬尧搞省议会的选举。当时，郴、永和湘西的辰、沅、永顺一带都在湘军手中。张把湘军所辖地区的选举委托邻近各县代办，长沙各公法团群起反对，并组织联合会，发表否认非法选举的宣言，在《大公报》和《湖南日报》作为“广告”登载；同时，两报也著论如以抨击，因而大触张怒，两报同时被封，并逮捕记者。后经各公法团出面交涉，申明该两报所登载的各公法团的宣言是广告性质，只能由各公法团负责，与报馆无关。张屈于情理，乃准两报启封。《大公报》复刊之日，照例又将停刊原由披露，因而再触张怒，当日再被封闭，久之始获复刊。一九一九

年五四运动发生，湖南学生奋起响应，湖南报界也大力支持，该报更辟专栏，推张平子主编，除尽量报道有关学生运动的消息而外，还约请了黎锦熙、杨树达、张慎安等撰写论文。刚刚登出这些论文的预告，即遭受新闻检查处的制止，并传张平子，加以斥责，说：“凡关于学生闹事的稿件，一概不准刊登。”张申辩说：“这次爱国运动是全国的重大事件，若是全无消息报道，还成个什么报纸！”该处负责人理屈辞穷，只好向张敬尧请示。结果是允许报道新闻，不准刊登评论。后来，该报把各地名人有关五四运动的论著，摘要地渗入新闻稿件中，陆续予以发布，瞒过了昏聩透顶的新闻检查处。在张统治湖南期间，该报虽屡遭查封，但由于有工商界作护符，乃得幸存。

《湖南日报》，是一九一八年九月创办的。社址初在长治路，后迁吉祥巷。由伍芋农（国民党员，长期从事办报）任经理，杨绩芬（衡阳人，国民党员）任总编辑，陶孝宗、许彦飞、曾松乔、徐汉涛等任编辑。该报偏重营业性质，政治关系是接近谭（延闓）系的；存在的时间颇长，从一九一八年创刊，直到一九二六年夏季才停刊。在张敬尧统治湖南期间，与《大公报》同是以工商界作护符，虽遭查封，仍获启封。

《立言报》，是杨振初（陈复初部队的秘书）等于一九一八年创办的。社址设在东长街。杨任社长，李白襄、龚振初等任编辑。杨、李、龚等都是湘西人，据传该报开办的经费是陈复初（湘西人，曾任师长）所供给的。仅出刊数月即停刊。

《正义报》，是湖北人杜启荣等于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创办的，以营业为目的。杜自任经理，其弟兮依任编辑，何少枚主編副刊，文海安、饶省三（文、饶均长沙画家）主編画报。杜原来是办通讯社的，企图通过鄂籍关系，依附张敬尧，但没有依附得上，卒

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因登载冯玉祥在常德独立的消息，为张所查封；杜被逮捕，并判处徒刑三年又六个月（在狱一年，获释）。该报未再复刊。

《公言报》，是湖北人傅钟英（号汉滨）等于一九一八年三月一日创办的，以营业为目的。社址初设在贾太傅祠，《正义报》被封后，迁入《正义报》原址。是年年底因转录汉口新闻关于王占元独立的消息，被查封；傅钟英被驱逐出境。

《正声日报》，是湖北人郭寄生等于一九一八年冬所创办的。郭自任社长。该报虽以政务厅长张荣澍为后台，但仍偏于营业性质。于一九一九年被封。

《公意报》，是湖北人方硕佛（国民党员，在湘办报多年）于一九一八年创办的，以营业为目的。张敬尧离湘后停刊。

《华赢觉报》，是谭笃恭（长沙人，国民党员）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所创办的，是反张的报纸。社址设在小西门外某日本洋行。该报借日人庇护，痛诋张敬尧。张恨之刺骨，贿买流氓控告谭为“匪党”，派探追踪，终于捕获，于是年九月枪毙谭于浏阳门外，为湖南报界人员被杀害的第一人。该报同时被封。

《通俗教育报》，在张统治湖南时期，改委安徽人韦启俊为馆长。内容比前大为逊色。

（六）

一九二〇年六月，张敬尧被驱离湘，谭延闿第三次主湘，为时仅数月。是年年底，赵恒惕迫谭离湘，继长湘政，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始被驱走。赵统治湖南达五年多。当谭进驻长沙以后，正值北洋军阀内部斗争激烈，湖南得免北军蹂躏，但湖南内部的谭、程、赵各派之间的斗争颇为尖锐。在此条件下，报界复趋活

跃。一九二〇年下半年，长沙的报纸多到十家，其中原在长沙的有《大公报》、《湖南日报》和《通俗教育报》三家；由郴、永随军迁到长沙的有《民国日报》、《新国民日报》、《新湖南报》和《民言报》四家；新创的有《大中国日报》、《民意日报》、《觉民日报》和《湘声报》四家。一九二〇年年底，赵独揽湘政以后，湘局粗安，谭、程两派势力逐步被赵排除，湖南内部派系斗争渐趋缓和。到一九二一年，长沙的报馆因而减少，继续存在的只有《大公报》、《湖南日报》、《民国日报》和《湖南通俗日报》四家。一九二二年起，陆续有所增加。一九二三年四月，《湘报》创刊，与《大公报》、《湖南日报》成为当时鼎足而立的三家大报。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入湘前夕，长沙的报纸又增到八家之多。

谭延闿倡言地方自治，省长民选，并自动取消督军名义，政治军事统揽于省长。赵恒惕继续标榜联省自治，外与粤（陈炯明）、鄂（王占元）等省互通声气；内则积极制省宪，办选举，并邀请所谓中外名流如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和勃勒克女士以及国内的章太炎、吴稚晖、张继之流来湘讲演，为其粉饰门面；对于报界则施展拉拢和贿买伎俩，企图利用它们为其鼓吹联省自治。例如一九二一年六月，赵派其秘书长李鸣九假天然台宴请报界联合会全体干事，当场宣布对各报的津贴：大报（每日出版两张至三张的）每月三千元；中报（每日出版一张半的）每月二千元；小报（每日用四开纸刊印一张的）每月一千元；杂志及通讯社（限于每日发稿的）每家每月从二百元至五百元不等。其时，《大公报》的持论是“地方自治”，与赵的所谓“联省自治”异趣。李鸣九仰承赵旨，企图对于《大公报》格外收买。李与《大公报》的张平子原先在湖南高等学堂同学，是日宴后，李将张请到内室，面给张以八千元的支票，商请《大公报》改变论点，转为“联省自治”

捧场，为张所拒绝。从一九二一年以后，直到一九二六年大革命前夕，即是赵离湘以前，湖南的报纸基本上是分属谭、赵两系的，谭系的报纸迫于形势，也不能不相对地依附于赵。《大公报》的持论虽与赵的主张不尽一致，但是并非反赵。直到北伐军进入长沙以后，才引起湖南报界的根本变化。

一九一二年以来，湖南各报仿照北京、上海的报纸，一般都辟有副刊。副刊的内容，在五四以前，大概是小说（包括撰著和译述）、谐文、杂俎、诗词、编者的话之类，各报大同小异，大都是陈腔滥调以至黄色文字，供人们消遣而已，故有“报屁股”之称。五四以后，副刊内容，适应新的潮流，起了根本变化，一般都是以论著为主，以传播新文化为中心。例如社会问题（主要是揭露和批判旧社会的黑暗面）、妇女问题、新文学问题、新诗问题（新诗与旧诗曾经有过较长时期的激烈争论）等等。这些在当时曾经是全国报界的论题，也反映到湖南报界。一九一九年江亢虎来湖南讲演他的“社会主义”，曾一度引起了湖南报界的注意，纷纷在副刊上著文予以尖锐的批判。五四以后，有的报纸还刊行了专载某一方面的文字的“特刊”，如《新文化特刊》、《妇女特刊》、《体育特刊》、《卫生特刊》、《科学特刊》、《学生特刊》等等，一般都是定期刊，由各有关团体或有关机关负责编辑，报馆仅负责刊印。

关于报纸的编辑排印各方面，在民国初年，一般都甚简陋，很少改进。一九二〇年以后，报馆既多，发生竞争，又受了外埠报纸的影响（当时如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等对于内容和编排形式，都有很多改进），对于新闻的采访、组织、排列和印刷各方面，才逐步有所改进。例如在排印方面，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间，新闻全用四号字，或四间二；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以后，逐渐改用五间三，迨后则一律采用五号字。到一九二〇

年以后，又改用新五号字或五号三。在标题方面，以前只用二、三、四号字；至是，一般都改用头号字，甚或采用特号字。

兹将这一时期的各报概况分述如次：

《大公报》，从创办之日起，即标榜是工商界的报纸，对于反对帝制，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曾经持论公正，博得社会人士的赞许。到了一九二〇年，谭、赵相继主湘之时，对于湖南内部的派系斗争，表面上是标榜超然态度，实际是偏近谭系的。在赵统治湖南期内（一九二三年三月），该馆因讥刺省议员为猪仔，被查封。复刊后，一度改组为《新公报》，月余以后，仍复旧名。

《湖南日报》，为张敬尧离湘前夕，与《大公报》仅存的两家报纸。谭军进入长沙后，怀疑该报是政学系的机关报，曾被查封。到赵主政时，始复刊。其时，该报内部分裂，陶孝宗、许彦飞等被赵收买，企图将该报变为政府喉舌，为伍芋农所拒绝，陶、许遂脱离该报，另办《大湖南日报》，隶属省政府。至是，《湖南日报》由伍芋农独力支持，直到一九二六年夏季停刊。

《民国日报》，原是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傅良佐入湘前夕被迫停刊的；旋因湘军驻郴，遂在郴复刊；一九二〇年六月，又随军迁回长沙。社址设在仓后街湘清里。是谭系的报纸。负责人仍是包道平（属于谭系，混名“包四牛皮”）、鲁荡平、朱凤翥、谭介甫等。该报于一九二三年，因经费困难停刊。

《新国民日报》是王亦僧（湘乡人，国民党的官僚）、陈叔伟等于一九一八年在郴州创办的；一九二〇年六月随军迁来长沙。社址设在府后街《长沙日报》旧址。数月后，因经费困难停刊。

《新湖南报》是李况松（衡阳人，国民党员，国会议员）、夏思痛等于一九一八年随湘军在永州创办的，是谭系的报纸。一九二〇年六月随军迁来长沙。社址设在北正街陆宅。是年冬，因李仲

麟被杀案件，牵涉该报，遂被查封。

《民言报》，是洪普拯、罗吟铎等随湘军在永州创办的，偏重营业性质。一九二〇年六月，随军迁来长沙。社址设在局关祠。赵驱谭后，该报著论攻击谭延闿，曾被查封，旋即复刊。延到是年年关，因经费困难停刊。

《大中国日报》，是成麟（号采九，宁乡人，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毕业，曾任建设厅科长、局长等职务）、蒋鑫等于一九二〇年创办的，是政学系的机关报。社址设在贾太傅祠。出刊数月后停刊。

《民意日报》，是程一中、马颂高等于一九二〇年创办的。是赵系的报纸。出刊数月后，因经费困难停刊。

《觉民新报》，是刘况、钟觐龄等于一九二〇年创办的。偏重营业性质，接近谭系。不久，因经费困难停刊。

《湘声报》，是徐明谔（号寒儒，益阳人，省议员）等于一九二〇年，由周则范出资创办的。不久，因经费困难停刊。

《湖南通俗日报》是张敬尧离湘以后，由《通俗教育报》改名的。改委何叔衡任馆长，谢觉哉为总编辑。内容刷新，成为当时少见的进步报纸。何去职后，龚心印继任馆长，历时四年。此后，傅熊湘、杨绩荪等相继任馆长，仰承赵的鼻息，声誉大降；杨去职后，熊亨瀚出任馆长，恢复了何、谢主持时期的精神，对于当时的革命浪潮，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工报》，是方僧根（益阳人，高等实业学堂学生）等于一九二二年创办的。社址设在局关祠。是湖南高实小集团（高等实业学堂部分学生所形成的）的报纸；政治上接近谭系。一九二三年停刊。

《商报》，是戴雪岑（湘阴人，国民党员）等于一九二二年创办的。社址设在太平街贾太傅祠。也是接近谭系的报纸。一九二

五年停刊。

《湘报》，是刘铤、唐规严等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创办的。社址设在皇仓坪。以萧立诚任总经理，刘棠猷任经理兼总编辑。是年年底改组，由陈强任总理，唐炳初任经理，萧石朋任总编辑，刘范猷、方正鹄、萧石勋、唐卜年、喻寄浑等分任编辑撰述。该报的前后主要负责人都是谭系的人，该报自然成了谭系的报纸。因经费困难，于一九二五年端午节停刊。

《大湖南日报》，是陶孝宗、许彦飞等脱离《湖南日报》后，于一九二四年二月创办的。社址设在定王台。以赵心筠为总经理，许笑隐为经理，陶孝宗为总编辑。是赵政府的机关报。一九二六年三月，赵恒惕被逐，唐生智代主湘政，该报指摘省议会迎唐为无耻，因而被封。后来，叶开鑫屡谋恢复，未能实现。

《甲子日刊》，是一九二四年创办的。出刊数月后即停刊。社址和内部人事，都已记忆不清。

(七)

小型报纸是用四开纸印行的，篇幅约为大报的一半，一般称之为“小报”。湖南的小报起源于《演说报》。它是一九一二年四、五月间创刊的。由于它存在的时间最长，影响较大，所以我把它列在“大报”的范围来叙述。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间，其他小报陆续出现，一般都是时创时停，为时甚暂。小报的内容：有的是新闻的简短报道，杂以议论；有的是黄色报纸。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以后，属于晚报一类的小报始日见增多。由于小报的名称多，起讫的时间短，难于回忆齐全，兹仅就记忆所及，简述于下：

《长沙夜报》，是何少枚（湘潭人，国民党员）、朱凤蔚（上海

人，开西药行的，喜欢写点杂文之类）、龚病侠等于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间创办的。以反对帝制见称，销数曾一度增到三千份以上。因经费困难，不到半年即停刊。

《潇湘雨》、《香国魂》，都是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间创办的。前者的主编为朱嬾仙（继仁），后者的主编为宋痴萍（宋与陈大悲都是“春柳话剧团”的演员。该团来湘演出后，旋即解散，陈转入京剧团，宋转办小报）。以上两报都是黄色报纸，出刊不久即停刊。

《霹雳报》，是宾步程、杨绩荪等于一九二二年秋季创办的。社址设在司门口。日出一小张。采用夹叙夹论的方式报道新闻，称为庄谐并出；也间能就反动统治者的枝节措施加以揭发指摘，以快人心意，被称为小报中的佼佼者。一九二三年八月，谭、赵战争爆发，谭军一度进入长沙，宾、杨别有新职，该报因之停刊。

《明星报》，是吴受珉（湘鄂印刷公司经理）、毕树森、蔡季襄等于一九二二年秋创办的。社址设在织机巷。以何少枚、徐汉涛等为编辑，郭耘桂（湘阴人）、叶德辉、粟谷青（长沙举人，老画家）等为撰述。内容偏重文艺。于一九二四年冬停刊。

《小小报》是伍芋农、何少枚、吴受珉等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创办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吴受珉逃往汉口，该报遂停刊。

《警钟报》，是王书麟（益阳人，原充警察）于一九二五年创办的。系营业性质。不久停刊。

《民立报》是伍芋农、鲁荡平于一九二六年创办的。属于谭系的小报。不久停刊。

（八）

湖南的通讯社始自李抱一、张平子的《湖南通讯社》，创办于

一九一三年春，社址设在犁头街。继起的是王道南的《湖南新闻社》，后由成嘉森接办。其时，还有督军署译电员孙斌，每日将可以作为新闻发布的电讯译送各报，虽然没有采用通讯社的名义，但起了通讯社的作用。由是长沙各报不仅有本省通讯社所供应的新闻稿件，而且有专电可以采用。各报大都另辟专电栏，并用二号字排印（一般新闻都是四、五号字）。一九一六年春以后，湖南的通讯社日见增多，其中略具规模的计有：傅英东的《中华通讯社》，唐寿林的《华美通讯社》，龚饮冰、黄性一的《亚陆通讯社》，杜启予、杜兮侬兄弟的《大中通讯社》，黎升岫的《三余通讯社》，陈兰荪的《兰新通讯社》等等。最盛时期，多到六、七十家。这些通讯社大都组织简单，容易创办，一般都只要访员一二人，挟着皮包，携带铅笔和几张复写纸，便可发稿。还有一人一社乃至一人数社以及仅仅挂上《通讯社》的招牌的，甚至有只刻一个《通讯社》的图章，连招牌也没有的。这类通讯社根本说不上采访新闻，更不必说发布新闻稿件了。他们的目的仅在于每逢三节（端午、中秋、春节）分函各机关、各大商店和大官僚索讨“稿费”，每户所给，有的少到数元，即可了事。当日通讯社的被滥用和新闻界某些人的丑态，于此可见一斑。

当时，各报的资料来源，主要靠“剪”，即剪自外埠的报纸。因此，有人讥笑办报的，与其称为“主笔”，无宁称之为“主剪”。至于专电，大都排在头版，列为专栏，数量的多少，是以各报经费的丰歉为转移，因之也就成为各报的声价的标志。有些报馆自己经费短绌，专电很少，甚至没有专电，遂至伪造或巧取电讯。省内新闻，本来全靠采访，较大的报馆都有自己的访员，并非全靠各通讯社供稿。因此，湖南的通讯社对于湖南报纸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它的较大的局限性。

(九)

湖南报界联合会始于一九一二年六月。它的组成分子是：《长沙日报》、《湖南公报》、《军事报》、《黄汉湘报》、《湘汉新闻》等报。内部组织，设干事一人，三月一任；由干事聘用书记一人，处理日常事务。由各报各缴入会金二十元作为经费。成立后，票选贝允昕为干事，聘左凌霄（长沙人，湖南高等学堂学生）为书记，假《湖南公报》为会址。其时，都督府颁布“新闻条例”，限制新闻自由，该会曾据理力争，遂使此项条例无形消灭。随后，《湖南民报》、《军国日报》、《演说报》、《天声报》等相继加入。是年七月，修改章程，改干事为会长，仍推贝为会长，另设干事二人，票选孙冀预、陶孝宗为干事。又设评议会，由各报推评议员各一人组成之，《湖南公报》为易篆真，《长沙日报》为傅熊湘，《军国日报》为方僧根，《湖南民报》为黄康圃，《黄汉湘报》为宋心伯，《天声报》为徐远，《演说报》为李澍。并由该会请准了新闻记者得列席政务会议旁听。十一月，又开会，再次修改会章，取消书记，改设干事三人，并推一人为主任干事。评议员由各报自行推举，改选了唐支厦为会长，张秋尘、黄康圃、陶孝宗为干事，并推张秋尘为主任干事。会址改设在《湖南民报》。当报界联合会初创时，参加的报馆较多，内部意见纷歧，不到一年，会章屡次修改，人事也屡次更易。一九一三年一月，联合会议决各报春节停刊期限，因《长沙日报》不履行公议，独自先行出版，引起唐、黄、张三人登报申明辞职；《长沙日报》方面也随之登报申明三人的辞职与该报出版问题无关；加以当时的党派关系，遂使报界联合会的组织更趋松懈。及汤芑铭入湘，多方摧残报界，并由巡按使署制定检查报纸条例（计七条），极力钳制新闻。袁世凯取消帝制后，该会

趁汤处境狼狈，乃获呈准取消了是项条例。在汤统治湖南期间，该会很少活动，形同消歇。一九一六年，谭延闿二次主湘，湖南报界再度活跃，该会也重整旗鼓。其时，改由入会各报轮流值月，会址也随之按月流动。由于刚从汤的暴虐压抑之下获得复苏，内部意见暂时尚较和协。迄张敬尧督湘，横逆不亚于汤，对于钳制新闻，摧残报纸，视为常事，连所谓条例也不必援引，各报又复相继被封，该会再度停顿。一九二〇年以后，谭、赵相继主湘，该会乃为三度的兴起，重新厘定简章，仍袭用第二届的轮流值月制度，惟固定会址，不随轮值单位迁徙，并由每报各推干事二人：《大公报》为朱让枏、张平子，《民国日报》为包道平、朱凤蔚，《新国民日报》为王亦僧、陈叔玮，《湖南日报》为伍芋农、杨绩荪，《新湖南日报》为夏恩痛、李况松，《民言报》为洪拯普、罗吟铤，《大中国日报》为成麟、傅纯贞，《民意日刊》为程一中、马颂高，《觉民新报》为刘况、钟颢龄，《学生周刊》为唐耀章。是届联合会的组织规模比前两届，已较完备。时值谭延闿主湘，对于报界虽已禁网略疏，但仍动辄援引“戒严法”来限制新闻言论，以至虐待记者。该会针对这一情况，曾向谭呈诉，援引谭所标榜的地方自治的要义，指责滥用戒严法令为背道而驰，从而力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谭对此呈诉虽未明置可否，但此后军政机关对待报界的态度，已有所改善。迨后，各报多先后停刊，会内的意见也渐趋分歧，该会又渐陷瘫痪。迄一九二六年，复扩大组织范围，把通讯社包括在内，并明确地区界限，改“湖南”为“长沙”，称为“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供稿）

长沙辛亥光复后的片断见闻

陶 菊 隐

长沙辛亥光复的前后情况，各方记录很多，我只把我所接触到的一些社会动态写下来。

一、新军占领抚台衙门，驱逐巡抚余诚格后，只杀了几个抗拒革命的官吏，省城秩序没有受到影响。人民群众热烈欢迎革命，彼此互道“恭喜”，就象过新年和办喜事一样。没有人害怕杀头充军，只有极少数反革命的地主豪绅，既怕革命党杀他们的头，又怕“王师一到，玉石俱焚”，他们的心情倒是十分沉重的。例如王先谦就逃往平江友人家中，叶德辉也逃往乡下“避难”。此外打轿子下乡的也只是些巨富豪绅之流。过了一些时候，这些人又泰然自若地回到城里来，照旧过他们的豪奢腐朽的生活，搞他们的勾心斗角的勾当。

二、剪辫子是光复后最早形成的一种风气，大家认为不剪辫子就是甘心做满奴和亡国奴的显明标志。于是在学校中剪掉同学的辫子，当街剪掉路人的辫子，施者每每引为笑乐，受者亦或啼笑皆非。有些遗老和顽固派，害怕没有辫子见不得皇帝，就把辫子盘在头顶上，用帽子遮盖起来，或者索性把头发全部留起来，改作道士装，借以逃过这一关。

三、当时还没有女子剪发的风气，女子剪发的风气是到一九二六年大革命时期才盛行的，但是女子放足却已开始盛行。那时

已有个别女子剪发，曾经受到当局制止。例如剪发最早的衡粹女学学生周永祺，组织了“妇女剪发会”，呈请官厅立案，民政长刘人熙斥为“不中不西、不男不女之怪现象”，不但不准立案，而且勒令她本人蓄发，恢复本来面目。

四、光复后，男女交际自由、结婚自由和男女平权的呼声很高，湖南有不少女子活动家被称为“英雄”或“女伟人”，名闻全国。但是她们多在省外活动，例如唐群英、王昌国等在北京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欧阳雅文在南京组织“女子北伐队”等。那时，湖南还没有一个女公务员，女权运动也不活跃，只有一家《女权日报》^①，寿命也不长久。直到“唐群英大闹长沙报”^②，湖南女子的声势才开始引起社会人士的注意。总的说来，辛亥革命后，妇女并未获得解放，社会人士还是用开玩笑的态度来对待女权运动。但是湖南女子已开始把旧礼教的封锁线打开了缺口，纷纷要求入学，要求有选择配偶的自由，因此女学校逐步有所发展，而自由结婚也不是家长所能绝对阻止的了。

五、关于服装问题，虽然有人建议加以改革，但是革命政府认为这是不急之务，而且事关全国，并未作出决定。湖南人很少有穿洋装的，街头所见，仍以短打朋友（劳动人民）和长褂子（非劳动人民）为最多。公务员佩带白布臂章，上面标明职别，加盖

① 《女权日报》设在南门城墙湾天后宫，社长似为丁佩兰。学生军解散后，我曾在该报担任编辑。

② “沈佩贞怒打宋渔父，唐群英大闹长沙报”，是当时报纸上戏拟的章回体。一九一三年二月，长沙日报广告栏刊有郑师道、唐群英结婚启事，唐群英率领多人到报馆追究广告来源，未得要领，于是大打出手，该报因字盘被打乱而无法出版。事件发生后，《长沙日报》提出诉讼，经谭延闿调停，并代出二千元赔偿报馆损失了事。事后查明，郑师道是一个精神状态失常的人，由于求爱不遂，登此广告，企图弄假成真。

来
①
6
月
11
日

机关印信，不久，改用铜牌证章。所谓“纱马褂与委任状”满天飞，是后来发生的现象^①。辛亥光复后，我曾经看见过青布（或湖绉）包头，前面打一个英雄结，身穿黄呢制服的军人。根据年长于我者的回忆，大街小巷经常有模仿戏台上武生打扮的青少年出现，但我没有碰见过。他们还说当时上层社会人士结婚所用礼服，有的女服仍是凤冠霞帔，甚至还有男的换穿纱帽红袍的怪现象。例如当时有名的社会人士宁协万就留有这种结婚照片，但我也没有看到过。

六、湖南响应起义后，出兵援鄂是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湖南原有新军一个混成协，共约四千人，起义后，每个营几乎都扩充成为一个师，共计成立五个师。因此，到处招兵买马，到处可以看到新兵操演，祠堂庙宇都驻满了兵。光复后招募新兵的特点：首先是这样大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而完成任务的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其次是以以前应募入伍的几乎全部都是城市贫民和农村贫雇农，而这次却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参加。这说明，人们踊跃参军已经不是单纯地为了解决饥饿问题，其中不少的人是为了参加革命。

由于学生参军的人数颇多，都督府决定先成立学生军一营，驻扎又一村讲武堂内。我的年龄虽不及格，但因身长合乎尺度，前往测验时，居然也被吸收了。我们在这个特殊的军营里受过几个月的军事训练，但是没有领到枪支，没有来得及开拔援鄂，就因南北议和告成而被解散了。

辛亥革命初期，招兵买马是湖南最突出的一个现象。如有人

^① 国民党“二次独立”时期，湖南省政府滥发委任状以应付来自各方的军人、政客。按委者均将白布出入证衬在纱马褂内，招摇过市，引人注目。

口称能在外府州县收编若干军队，湘军都督往往不加调查研究，就给以司令名义和部分经费，因此，各县有不少赤手空拳的司令出现。他们的实力只有门前守卫的两支枪，甚至这两支枪也还是从别处借来的，也还有人骗钱到手，一去不回。这种乱糟糟的现象，在以后政局变动时期都曾发生过。

七、湖南起义后的第十天，就发生了一次大政变，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都被乱兵杀害，原諮议局议长谭延闿被推为都督。长沙社会对这一血案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人认为，反正^①只有十天，就杀了两位都督，这究竟是革命呢还是争权夺利？另外一种人则说，焦达峰出身“会匪”^②，陈作新不过是一个被革了职的新军排长，他们做了都督，压不住众人，谭三先生（谭延闿）门第声望都好，从此湖南政局可以走上正轨了。我们还听到关于谭延闿被迫上轿的说法。据说焦陈被害后，他躲在荷花池私宅不肯出来，湖南绅士们首先说服了他的母亲，他才奉母命出山云云。我们没有想到，这种传说是谭延闿自己编造出来的，目的在于万一革命失败，可以取得清政府的宽恕；我们更没有想到，这次政变就是谭延闿和君主立宪派篡夺革命政权的阴谋所酿成的；因而还误认谭延闿是个颇得人心的“好都督”。

八、湖南响应起义后，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但是财政经济上所受影响很大。由于兵额骤然增加，税收尚未统一，新政府所负担的庞大军费没有来源，只得设立一个“筹餉局”，按房地产、田产的多寡来摊派捐款。这一措施立刻遭到地主、绅士的激烈反对，把它说成是“暗无天日”，“鸡犬不宁”，甚至同情革命的

① 当时称脱离清政府为“反正”。

② 焦达峰为联络会党分子起义，曾加入哥老会。

上层社会人士也都不以为然。例如在上海作寓公的前清军机大臣瞿鸿禨，他在草潮门正街置有巨宅一所，经常有人前往收捐，大绅士熊希龄、张其鏗（谭延闿的同科，与谭关系密切）都在省外为他打电报来加以阻止。他们认为，推翻皇帝是另一回事，至于侵犯私人财产，损害地主、绅士的利益，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于是革命政府只得用增发货币的手段来填补财政上的赤字。当时由湖南官钱局改组的湖南银行，所拥有的资本仅数十万两，而前后发行钞票竟达二千二百余万元。此外，大地主朱云谷堂、大企业和丰火柴公司等也都发行票币流通市面。因此，纸币不断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直接受害的都是劳动人民。

一九一二年二月，南北和议成立后，湖南因财政困难而大举裁兵，对于退伍军人，特别是残废军人，并未给以妥善的安排。因此，由湖北退回来的断臂缺肢的残废军人组织了“伤兵乞丐团”，成群结队地到处请愿，到处强讨恶索，使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

九、辛亥革命初期，都督府在西园设有“招贤馆”，广招天下“英雄豪杰”和“奇才异能”之士。但是没有“八行书”（荐信）是不得其门面入的；而有了“八行书”，也要看“来头”如何，“来头”不大的只能住在“招贤馆”里候差，吃饭不要钱，所以“招贤馆”成了候差人员的招待所。不久，也就宣告结束了。

随着政局的转变，湖南政界抢饭碗、争位置的丑剧不断发生。首先是同盟会与立宪派之争。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谭延闿以湖南立宪派首领而兼国民党湖南支部长，他在立宪派与国民党之间，南北势力之间，新旧派别之间，政客与军人之间，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采取了面面敷衍的态度，因此有“八面玲珑”之称。其次是路界之争。湖南划分为中、西、南

三路是从前清科举时期开始的，目的在于按地区分配科举名额。光复后，各路人士又力争按地区分配政治用人的名额。例如省议会有正副议长三人，必须按中、西、南三路各居其一，民政长以下各司司长人选，也必须三路平均分配。党派之争再加上路界之争，把湖南政界闹得乌烟瘴气。

十、光复后，湖南的政界风气起了深刻的变化。前清时期，官吏可以纳妾蓄婢，但是不许宿娼叫局；可以把酒席叫到家里来吃，但是不能公开地上馆子。那个时候，长沙著名菜馆有清溪阁、徐长兴、玉楼东、天然台几家，“堂吃”所占的地位都不大。樊西巷、福源巷一带“花街柳巷”，官吏不敢问津。官吏宿娼被认为“有玷官箴”，可以被参奏革职，甚至老百姓可以把他拉下轿来揍他一顿。光复后，这种假道学的风气不存在了，官吏、议员不但可以在饭馆子里叫堂差，大吃大喝，而且可以到妓院摆花酒，大宴宾客。因此，原有的饭馆子都扩大了门面，并且陆续增加了曲园、挹爽楼、一枝香、天乐居等家。娼妓的人数也大大发展了；

谭延闿阴谋推翻革命政权

——焦、陈被害前夕都督府的一场争论

张 知 非

当焦达峰组织湖南军政府之始，谭延闿担任民政部长，与参谋长曾杰、秘书长刘仁镜同宿都督府，其卧铺与刘仁镜只隔一幅帷幕，在形迹上颇形亲密。曾与刘少时曾受业于史学家邹价人（新化人），称为邹门豪杰，极其相契。焦达峰起义之前，刘已侨寓长沙，与焦联络，居中策划；而曾则偕焦奔走运动，自负足智多谋，极为焦所倚重。焦为人质直，完全是农民本色，少权变。以当时职权而论，曾杰确有左右都督之力量。谭延闿与他们共事不久，即与其私党图谋不轨，以杀害焦都督为夺取政权的手段。事为刘仁镜所侦悉，密言于焦与曾。焦问秘书长主张如何？刘答：“先发制人，我主张枪毙谭延闿，解散参议院，来一个彻底的改革。”曾杰不以为然，与之辩论。刘说：“政治上的斗争，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曾杰强调：“我们革命要王道，不要霸道。”刘见其主张不被采纳，复陈上、中、下三策：上策，都督亲率大军援鄂；中策，派遣上将作先锋，都督统兵继进，驻节岳州，以察其变；至于安坐长沙不动，等于瓮中之鳖，其祸害不堪设想，是为下策。卒由参谋长曾杰决定，派王隆中率师援鄂，都督仍留守长沙。祸发之前两晚，刘即携被出宿太平街某漆店。叛军既杀焦都督及副都督陈作新，当即拥戴谭延闿为都督。谭犹故作姿态，

藏匿不肯见面。叛军围其公馆，向屋脊开枪，谭始出而就职。这出政治悲剧遂告结束。

我与刘仁镜（字观海）在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同学。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刘充任沅江县知事，我充知事公署秘书时，刘曾向我谈及：辛亥光复后，他曾一度任都督府秘书长，当焦、陈被害前夕，已经侦悉谭延闿阴谋夺取湖南政权，将不利于焦；关于如何对付此一局势，他曾与焦达峰都督、曾杰（字伯兴）参谋长发生一场争论。当日刘言之甚详，距今已四十八年，殊难完全追忆。兹仅记其大概如上。

（民革湖南省委员会供稿）

一九一〇年长沙饥民抗暴见闻

文 斌

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春，长沙贫苦市民因米价昂贵，无处籴买，受着当时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迫不得已，群起斗争，酿成焚烧抚台衙门的惊人事变。关于这一重大事件，湖南近代历史文献已有所纪载。我那时年方二十，正在湖南高等实业学堂肄业，耳闻目见，记忆犹新。现就记忆所及，将事变的起因和群众斗争的情况及反动统治阶级的处理经过，草成此文。

首先谈一下这次事件的起因。大家都知道，洞庭湖垵田收成的丰歉，关系湖南民食极为重大。俗话说：“滨湖熟，天下足。”反之，滨湖歉收，湖南人民的食粮便将受到严重的影响。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春夏间，湖北荆江和湖南沅澧二水同时暴涨，以致南县、华容、澧县、安乡、常德等县的堤垵溃决极多，所存无几，全省许多地方，也都遭受水旱灾害，普遍歉收。长沙粮食的来源，主要是靠滨湖各县。这样一来，运进省会的粮食，自然大大减少。这时邻近省会各县如湘潭、宁乡、醴陵等县，也因年岁歉收，米价奇贵，贫民无力籴买，大户又囤积居奇，不愿出售粮食，群众为饥饿所驱，已有向富室“吃排饭”的行动。我们学校同学，常有家信谈及。作者原籍醴陵，此风更甚。这是一九〇九年冬季的情况。省会方面，因仓库尚有相当数量的存粮，这年冬季还可勉强度过。到了一九一〇年春，听说市内公私存谷只有三、四

十万石，按当时省会人口计算，不足两个月的需要。而距离新谷登场，还有数月之久，在这种情况下，人心浮动，是很自然的。我记得我们高等实业学堂，常年四季每天都吃三餐干饭；到那年春夏间，早晨已改吃稀饭。我还记得往年丘陵地区 and 山乡的贫民，在青黄不接的时期，多向滨湖地区或邻近省垣的富裕县份逃荒，而一九一〇年的情况恰恰相反，灾区贫民多向长沙市区行乞，大批饥民涌入省垣。在省会存粮已感不足的情况下，又加上这样多嗷嗷待哺的外来饥民，问题便更加严重了。

自然灾害和民食艰难的情况既如上述，如果没有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及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不顾人民死活，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个人为的因素，或许不致激成如此巨变。无如利令智昏的湖南巡抚岑春煊（浑名岑老五）倚仗父兄和老师的势力（其父岑毓英，历任巡抚、总督；三兄岑春煊，为慈禧太后的宠臣；其师张之洞又是煊赫一时的体仁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不特不设法救灾，反而驯顺地履行一九〇九年与英美日三国商人签订的运米出境的照约。明运之外，还有暗偷。我曾听得曾任长沙市商会主席左学谦说过，一九〇九年湖南谷米出境的数目，暗偷的部分不少于明运的部分。从事暗偷勾当的，是一批外地的奸商。他们勾通官府，把湖南的粮食，一部分偷运往广东出口，一部分运往省外各大城市高价出售。这样一来，本省的粮食问题便变得更加严重。当省会局面已临危急阶段，邻近各县贫民“吃排饭”的事也日见增多，岑春煊才被迫咨准清廷总理衙门，颁布布告，禁米出口；同时借办义赈为名，发起劝募绅捐，冀图缓和紧张局势。而以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孙宪教等为首的豪绅，认为此举于他们不利，反要求岑开仓平糶，企图借平糶抢到更多的谷米，从中谋取暴利。因此豪绅和抚院之间发生矛盾。左学谦在某次谈及

长沙饥民闹事时对我说过，当日长沙豪绅囤谷居奇者，以叶德辉为首，仅他一家存谷就有一万多石；其次为杨三豹子（杨巩），约有七、八千石；王先谦、孔宪教等人也都有大量存粮；一班米商亦复存粮不少。因官绅不睦，此推彼诿，真所谓“道士斗法，病人吃亏”了。左当时曾极力奔走斡旋，不得要领。由于官绅斗法，造成米价高涨，贫民难以忍受，蠢蠢欲动。岑春煊据报，即令长沙知府和知县召集众绅在席少保祠开会，谋求解决办法。卒以双方利益冲突，会议没有结果，米价因而愈益飞升，无法制止。往年长沙米价，每升大约三十文，荒年亦不过五十文，而当时则早晨米价八十文，中午八十五文，晚上竟升到九十文；有一家八口，终日奔走，难得凑足一升米价的。加以碓坊闭歇，饥民根本上买米不到。当时我曾听到同学谈及一桩极悲惨的事：南门外有一个以挑水为生的贫民黄某，手中仅存制钱八十文，满以为可买得一升米。不料他妻子持往社坛街某碓坊籴米，米价已升到八十五文，没有买到。其妻愤恨之下，跑到老龙潭投水自杀。两个小孩立在潭边哀声哭泣。黄某赶到，见状悲痛万分，不能抑制，拖着两个小孩一同投潭溺死了。这个消息当晚传遍全城，人心大为激动。这不过是当日无数悲剧中的一桩而已。奸商豪绅，既不顾人们死活，乘机大肆掠夺；民众要求官府开仓平糶，又不获准；因此自然地把仇恨集中到巡抚岑春煊身上，斗争就这样起来了。

我记得这年（一九一〇年）夏历三月初四下午，我往市面上购买文具，只见到处都有群众麇集，公开大骂“狗官”。到傍晚的时候，市面上更为紧张，南门外碧湘街一带的群众竟聚集数千人，高声大骂官府。岑派出府县当局和长沙协副将杨明远前往开导弹压。杨到达后，立即被群众包围。于是岑又派巡警道赖承裕前去弹压群众，解救杨出险。据我们学校工友某告我，当时他看见赖

乘坐绿呢大轿，随带弁兵多人，就鳌山庙大空坪召集群众训话。这家伙不识时务，竟对群众大声斥责道：“我们福建人在茶馆里喝一壶茶，要一百文左右；你们长沙人进茶馆的，也花同样多的钱喝一壶茶，为什么不嫌贵？米为主粮，每升制钱八十文，你们就闹起事来，这就是造反，造反是要惩办的！”群众听到这样糊涂的话，蜂涌向前，把他的翎顶官帽摘下，并将他捆在鳌山庙侧的柳树上，饱以老拳。岑春冀闻报，急增派兵勇前去，方将赖解救出来。当天晚上，群众愈聚愈多，据学校派人打听，约有万人上下包围了抚台衙门，要求岑抚出见，并大声叫喊“抚台给我们饭吃！”同时坚决要求将被捕的饥民刘永福放出。岑春冀看到形势不妙，悬牌表示次日举办平糶。群众以岑信誉扫地，不听他的，将牌捣毁。而据称刘永福当时没有押在抚署，无法立即释放。群众因之更加愤怒，立将东西辕门和照壁捣毁，锯桅杆，毁石狮，并有一批群众向内堂冲进。岑令卫队开枪，死伤了一些人。次日上午外面风声紧急，我们学校无形停课。我想出去看看热闹，走到了贡院西街（现在的中山东路）曾国荃私宅门前（当时大门上挂有“威毅伯第”一块木匾），人众拥挤，不能前进。只听得人声鼎沸，看到火光烛天。忽然之间由抚署方而发出一阵枪声，登时群众如潮水一般后退，曾宅立将大门关闭。我机警地挤入曾宅。因为我当时着有学校制服，宅内的人允许我往晒楼上观看。我在那里呆了约二小时，远远望见抚署火焰甚炽。旋曾宅有人探知抚署内号房、赍奏厅、文武巡厅、大堂、二堂等处都被焚烧殆尽。这一次官逼民反的大事变发生后，岑春冀畏罪，急电清廷自劾，并保布政使庄赓良署理巡抚，随将抚院关防交庄赓良，自己悄悄溜走。

庄赓良本来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在湘作官多年，总想一尝巡抚味道。而岑春冀因自己认为有靠山，平日也瞧庄不起。庄

在事变发生前和事变过程中和湖南劣绅头子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教等勾结一气，幸灾乐祸，企图坐收渔人之利。当岑奉诏革职，新任巡抚尚未发表，庄以布政使护理巡抚的时候，王、叶、杨、孔等唆使一班喽啰背着几块高脚牌分途游街，牌上写着“众绅公议，平价申冤，藩台担任，诸君请退”十六个大字。我于初五日下午在府正街亲眼看到这种场面。又于是日下午在东长街（现在的蔡锷中路）看见庄乘坐绿呢官轿，后面有一群人高呼“庄青天”，庄也假惺惺地装出一个深表同情于贫民的样子。庄在接到抚院关防后，曾办理一个极短时期的平糶，借以笼络人心。可是当群众的斗争继续发展，并把锋芒转向帝国主义者的时候，他作为帝国主义的忠顺奴才和屠杀群众的刽子手的真面目，便逐渐暴露出来了。

事实的经过是这样的：当群众知道这回长沙米荒，天灾固然是一个原因，而美英日帝国主义者的商人贿通官府，运出大批谷米，乃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们便把攻击的矛头转向洋行、教会这些帝国主义的侵略机构。在初五晚上，帝国主义者在长沙的侵略机构被焚烧、捣毁的极多。现在能够记忆的，被焚的有：长沙海关、英商太古洋行趸船栈房、怡和洋行趸船栈房、北正街美国圣公会、道门口信义会、北门外两天主堂、大西门河街英美烟草公司、西长街挪威教堂等。被捣毁的有：东牌楼遵道会、学院街内地会、社坛街福音堂、大小西门一带美商美孚洋行、英商怡和洋行、德商瑞记洋行、日本领事住宅等。此外城厢内外各碓坊、堆栈之米，在先一晚已被抢劫一空；巡警岗位之被打毁者，更不可胜数。公立学校也有被波及者，如中路师范学堂、长沙府中学堂等。当日传说，因谭延闿那时任中路师范学堂监督，他又是諮议局议长，地位高，声望好，本有责任向清廷主管部门力争

早日取消外商运米照约，他竟淡然视之；他与王、叶等豪绅关系密切，本可说服他们赞助举办义赈，他却采取依违态度。群众对谭恨之甚深，因而涉及师校。至府中学堂原设在学院街三府坪，与某教会邻近，或系被波及者。这是当时的一种说法，可能出自揣测。但其他学校在这次事变中并未遭受损失，却是事实。可见当时关于“暴民”“仇视学校、破坏教育”的指责，显系故意造谣，中伤群众。还有一事可以证明这种谣言毫无根据：当事变发生时，我曾穿着学校制服外出探看，随处都遇到饥民，他们不仅对我毫无危害，且无一语辱骂，其余可以概见。

当初五晚上群众毁损外人财产的事件发生后，庄赓良惊惶万状，即于次日清晨，召集省会官绅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采用残酷镇压办法，并立即付诸实行。是日上午我在府正街看见长沙知府汪凤瀛率大批兵警巡街，兵士高举“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的牌示。不久又在青石桥（现在的解放路）遇见一个头戴翎顶、身披马褂的大员跨着骏马，前后有士兵十余人护卫；走在前面的一个刽子手，一手拿着尚有血迹的马刀，一手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游街示众。听街上人说，这位大员是兵备道吴某，被枭首的人是在小西门外“滋事”当场被拿获的。又听说他们在南门外还杀了几个人。自初六至初九，这数日间，城厢内外满布兵警，无辜被戮者，时有所闻。长沙市的饥民暴动就这样被压平了。邻近省会各县的饥民暴动，也被庄赓良及其后任严厉镇压下去了。

当岑春煊出走以后，庄和王、叶、杨、孔一班劣绅正在洋洋得意之际，不料美英日等驻京使节以洋人财产被毁，向清廷提出交涉，索赔巨款。庄虽百般阿谀、迁就，无奈帝国主义的贪欲难餍，问题仍迁延不能解决。清廷对岑、庄二人均不满意，二人同被革职，调湖北藩司杨文鼎继任湖南巡抚。其余有关官绅也都

受到处分：劣绅王先谦、孔宪教分别降级、叶德辉、杨巩革去功名，嗣后不准干与地方事务。当处分案发表后，叶德辉认为自己受了委屈，他写给苏州金庭学校校长方新（我们高实同学）的信中有“愧居王后，耻在杨前”一语，方将原信给我看过。因为当日两湖总督瑞澂参劾以上四个劣绅时，王列头名，叶第二名，杨第三、孔第四。王曾任岳麓书院山长和国子监祭酒，地位较高，杨是一个贪污吝啬的小人，故叶有是语。其实叶也是一个衣冠禽兽，与杨是一样的坏东西。此后数年，他们稍为敛迹。至于赔款问题，经新任巡抚杨文鼎反复与外人商量后，结果以库平银八十八万两了案。这个数字是学堂监督曹典球告知我们的。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